

## 第十二章

# 近代教育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进程中的思考与行动

学术界认为,现代化起源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余地区,然后向亚非拉美蔓延。早在“五四”时期,我国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西化”与“欧化”,指的就是现代化这个概念。当时人们认为,西方即欧美列强是现代化国家中独立富强的典范,中国要走向独立富强,就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奋起直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中国人早期的现代化思想。今天,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经趋向多元,具体可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历史过程;第二种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第三种认为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第四种认为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sup>①</sup>

---

<sup>①</sup> 现在,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现代化概念被赋予了更多更新的含义,广泛应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对“现代化”学术界迄今没有较一致的看法。

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因此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现代化,自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里只想从历史的角度,透视现代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以及它的影响与传播。具体来说,就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深刻变化。

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原生形态,那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过程,一般采用渐进的演变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晚近的亚非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则大都属于诱发型,那是在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时间短而集中,往往采取突变的方式,其中也包括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为社会改革奠定一个可资发展的初步基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属于后一类型。从现代化理论框架来看,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国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运动,都可称之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sup>①</sup>

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运动来看,教育家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抗拒、被动接受到有意模仿西方教育现代化继而自觉探索教育本土化的过程。从近代教育现代化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方教育思想与理论的传播使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体系发生裂变和动摇,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为近代中国教育家提供

<sup>①</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了西方的现代化教育模式和范本。经过在本土艰难的探索和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本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所以,严格地讲,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不能、实际上也没有完全追随着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轨迹。我们只能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在‘目标的视域’上确实是以西方教育的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标准的。当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现代’(或更确切地说‘超越现代’)文明视野是与资本主义的现代的文明模式断然有别的”<sup>①</sup>。

## 第一节

### 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 与教育现代化运动

#### 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思考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表征了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生转变的程度。因此,“现代化运动的特色之一是

---

<sup>①</sup> 参见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它是根源于科学与技术的,特色之二是它是一全球性的历史活动,更明确地说,现代化运动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形变的近期产物,它是17世纪牛顿以后导致的科技革命的产物,亦称工业革命。据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是发源于西方社会的”<sup>①</sup>。由于现代化的特性是以科技为主导性的,而科学与技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亦即无时空性的和具有普遍性的,所以,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指西化,其内涵应当是世界性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但是,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最初认识并没有这样的深刻,仅是狭隘地把它理解为“西学”、“西技”、“西化”。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士阶层和知识分子“独奉儒术为圭臬”,培养的是皓首穷一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因此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能滋生现代化的种子,中国的历史文化必然对现代化的强行传入产生众多负面的抗拒效应。要先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对现代化产生抗拒现象,就要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之特征及其文化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系统。对全社会系统发挥整合功能的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官政治体系,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文明秩序。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代有损革,但它的基本性格,特别是社会结构、教育思想、生活形态与深层的意义结构一直延

---

<sup>①</sup> 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续到清末”<sup>①</sup>。可以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无大变局,亦非全停滞,而是呈现一种“移动的平衡”(moving equilibrium)状态(亦可视为一种演化的转变)。而这套政治文化体的延续,依赖于深密繁复的文字传统、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因此中国社会的统协性极强,它自己不易开出基本的“结构的形变”(structural change)。当本土文化还充满生机时,异域文化只能处于一种被异化的地位,而不能形成积极的挑战;只有当本土文化日暮途穷或相对落后于异域文化时,异域文化的冲击才会显示出某种摧枯拉朽的力度。中西文化碰撞早在明末即已发生,但中国文化的危机却迟至清末才出现。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对现代化的排斥与抗拒,也是中国现代化必须由外力的强行冲击才能启动的主要原因。

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以坚船利炮撞开了国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裹胁着血与火的西方技术,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认识是一种邪恶与威胁。故当时大臣中有“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机器为公愤者”。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还是要“以夏制夷,以夏变夷”,认为华夏文化高于西方技艺,西方技术不过是“奇淫技巧,雕虫小技”。甲午战争遭到惨败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开始剧烈地冲击着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国的知识界逐渐产生了与传统观念

<sup>①</sup>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截然不同的新思想,通过中西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比较,开始以新的价值取向代替旧的价值观,并且已能用客观的和探索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现了在所谓“天朝大国”之外还有更先进的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正是这一发现,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开始了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尽管形成了两大思想阵营——革新派与保守派,但是在对中国自强的终极关怀方面是一致的。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当然,这种“防御性现代化”的范本取材于东邻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成功并不是它丢弃自己的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化国家。<sup>①</sup>自19世纪起,日本人便完全认识到,为了民族的生存,必须吸收西方的数学、科学和技术,但同时需摒弃西方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准则。他们不无傲慢地迷信他们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文化与宗教的优越性,以拒绝西方的文化和道德准则。但同时,他们又十分谦卑地着手仿效,不久甚至超过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在充分认识到“日本讲求西学,大著成效”后,知识界才开

---

<sup>①</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胡适等人所倡导的“充分世界化”理念<sup>①</sup>。在知识界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才缓慢地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启动。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本身做出反应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的反应是文化与教育的反应,于是引起了“孔化”与“西化”之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西化派随之一分为二,形成了“西化”与“俄化”两大派的斗争。从孔化派中也分化出现代化的新儒学。新儒学派并不是传统儒学的继续,实际上它已经变成半西半儒的复合体,表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多元形式。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试图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努力使“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看,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失败或不太成功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单向运动过程,现代因素简单地

<sup>①</sup>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所摧毁。由于现代化在中国最初传入是以强力单向运动形式产生的,因此它对传统的破坏作用与传统对它的抵抗作用是相当的。这种作用的持续也就延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一直处于冲击—反应的状态。最后改变这种状态的因素仍然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日本成功的现代化范例。“如果追溯一下日本教育在西洋化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即从模仿德国改为模仿美国,不难看出西洋化与日本化并不是经常对立的。日本化(或者说为实现日本独自的近代化所进行的努力)与西洋化之间至少有一部分是相互吻合的。历史的变化不会是按照作用与反作用的形式进行,也不可能在西洋化之后必定要出现一个日本化。对于日本来说,它是经历了从异质的西方化,转变为比较接近自己情况的同质的西洋化道路。这样一来,西洋化本身的内容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sup>①</sup>。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看到了日本化与现代化交织后的同质性的巨大作用,于是,首先在思想界作出了对现代化认同的最初反应,这种反应也恰是在寻找中国化即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同质点(中国特色),由此开始了因因相袭的文化变异与教育变革。

## 二、中国教育现代化运动的探索

从中国近代教育史来看,教育现代化的最初反应模式,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所领导的同光洋务运动。这是

<sup>①</sup>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4页。



一场典型的防御性自强运动,反应在教育中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它表现了洋务派在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但它的保守性减缓了中国教育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又在客观上催化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和新式教育的诞生。绵延三十多年的洋务思潮,孕育了思想观念方面的重大变化,以洋务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传统观念,萌生出面向现代化新意识和新观念。他们第一次在教学内容上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语言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使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能够适应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能够适应中国的政治变迁和思想演进,以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但是,试图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洋务运动,仅主张在“用”上变革,而在“体”上主张不变,这就不得不使当时的现代化进程流于形式。

从洋务教育的目标来看,办新式学堂是一项主要工作。在三十几年的时间内,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几十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为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一类为军事学堂,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广州鱼雷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应该说,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仅限于“西技”和“西艺”,是相当肤浅的。然而这又是近代教育变革必须要走的第一步。任何文化的变革,总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的,因而最直观的印象便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认识反应到教育上,便首

先表现为教学内容的改革。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奠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专科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最初基础,为新教育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的打开却也导致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撞击和冲突,中国士阶层和知识界在文化与教育的选择上分野为两大派系:洋务派和顽固派。由此而出现了三次针锋相对的教育论争。第一场论争是在1867年,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起因是由于洋务派要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无疑使洋务教育由语言方面扩大到了科技方面,动摇了“道本器末”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传统教育的根基,这就必然触动了封建士阶层的地位,因而遭到了士阶层的顽固派的驳斥,他们引经据典历数天文算学馆的弊端,极力主张撤消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这场争论直到清帝亲自干预才告结束。第二场争论是围绕着是否应变通科举而展开。在当时“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的情况下,洋务派认为应另辟一科以选拔洋务人才。这一主张较前更为深刻,更为传统价值观念所不容,因而顽固派的反应是强烈的,害怕此例一开,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虞。第三场争论是围绕着留学教育而展开的。这是由于顽固派怕留学生都已美国化或洋化,不负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这场争论以全体留学生幼童撤局回华而宣告结束。

洋务教育的这三场论争,反应了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斗争,洋务派之所以不能成功,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并不是新生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只能在器物层次上实现他们的

改革愿望,而不能在制度层次上实现彻底的变革。洋务派由于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去寻求理论武器,加之中国近代现代化的实践也才刚刚起步,还不可能提供促进新文化发展的土壤与环境。他们只能抓住魏源的师夷以制夷的这面旗帜,只能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中受点启示,稍做变通,以教育的某些变革来适应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但是,洋务教育的自强精神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从而也正式揭开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变异和教育变革的序幕。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二个反应模式,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是把同光的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sup>①</sup>。这就是说,洋务运动只理解到西方现代文明“物质的技器层次”,重点在“开铁矿、制船炮”;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则进而理解到要“考求西法”,亦即进入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制度”层次。在从制度层次思考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时,康梁深刻地揭示了八股取士制度的腐朽性。正如梁启超所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附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在国家面对强敌,而缺乏人才以自卫的情况下,梁启超向光绪皇帝建议:“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sup>①</sup> 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以育人才而御侮。”<sup>①</sup> 在康梁的努力下,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准奏,终于废除了八股制度,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一记重创,形成了接受西法西政改革中国旧制度的知识分子群体,加快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空前活跃的一支社会力量,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也为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他们整体素质的提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戊戌维新最后在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尝试是失败了,但却形成了与传统抗衡的维新派精英集团,这批人淡化了与地方乡土血缘的联系,构成了流动性很大的知识阶层,他们在群体存在方式上呈现出一种游根无垠的状态,这种变化使他们在最大限度上背离着传统,并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就使他们成为思想的流浪者和反叛传统的“新型边际人”。正是这批人积极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他们所提供的各种社会变革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取向影响着近代中国后来的思想家们。

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之一严复,以著译西学而蜚声九州。因此,历史上将严复称为中国最早而突出的“全盘西化”的代表,他的体用一致的思想被视为“全盘西化”的标志,殊不知,这却是他一个全新的教育原则模式。严复毕生处于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交汇的时代,在这一中西文化教育的交汇点上,他求索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实证论者,他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介,目的是要全面学习西方,讲求救国自强。他的变法救国

---

<sup>①</sup> 朱有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79页。

理论深刻而具特色。独特的受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所构成的对西方学术较深刻的认识,使他不再把目光投向延绵数千年的古代,也不再如洪秀全一样力求将西方基督教理想向中国做社会移植,而是站在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时代的高度。这一高度,既非没有亲眼见过西方文明制度,不能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原著的康有为、梁启超可比,也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以及号称精通西学的王韬、郑观应等所能望其项背。严复认为,中国变革入手之端和根本,就是“鼓民力”、“新民德”和“开民智”。要完成此举,教育无疑就是一个最为主要的途径,因此他将政治变革归为教育变革。可以说,严复虽然强调西学,但是他却在不断地探索西学中化的问题,他的研究并没有脱离本土。他曾一度提出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以近代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为标尺,融合中西文化教育。虽然,严复大力倡行西学,受种种原因限制又不能辩证地应用西学;他尖锐地批判过中学,而无奈又自觉地回归“传统”。但是,这种矛盾的现象并不能掩盖严复作为中国早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启蒙家的作用和历史功绩。他对现代化与本土化未能有机结合的遗憾和局限,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填补和超越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第三个反应模式,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意义,最主要的乃是它结束了二千余年的“朝代国家”形态,而代之以一“民族国家”的形态。亦是结束了传统中国以文化为基底的“天下性”结构,而代之以一个以政治为基底的“国家性”结构。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个突破与创新,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

程中是一极重要的里程碑。<sup>①</sup> 为了使国家富强发达,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正确地培养和使用人才便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要素,发展教育的作用尚不仅如此,教育发展的程度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明建设程度,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远。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一半。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是很外在的和很短暂的,虽然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是面向全体国民,其教育构想比较倾向于民众教育的普及和全民教育素质的提高。但革命党人却始终未能克服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的距离,不是把农工大众视为举足轻重的革命动力,而是视之为有待解救的对象。要么乐观地估计民众对民主共和的热情,要么归到改良派的思想境界。由于他们认为民众受专制流毒太深,民智未开,觉悟太低,所以革命党人十余年的革命发动仅在于华侨、会党、新军和知识界中,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就成了孤立和狭隘的活动,这样,也就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因此也就不能胜任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中国教育现代化在近代的第四个反应模式,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多面向的运动,但其思想动机则在感到中国之传统文化与民主共和之精神不契,而认为要想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必须从改变

---

<sup>①</sup> 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大众的思想行为着手。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的观点清楚说明传统中国的文明秩序必须要面向世界,因此,在这一时期,西方大量的教育论著和各种教育思潮纷纷被引介到中国,特别是胡适深受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信仰,使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之,由此也触发了中国近代 20、30 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教育救国思潮。教育救国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知识分子自觉地探索报效民族事业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开辟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探索之路的伟大实践。<sup>①</sup> 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围绕科学与民主的主题与核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体系予以了猛烈的冲击,而且为日后的教育发展,特别是教育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一时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孕育,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教育与政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尽可能地在广大工农大众中进行革命的、科学的教育,正是民主的科学的,开始标志着近代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者,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

---

<sup>①</sup> 本文所述的中国现代化的四个运动分期参照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14 页。

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科学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新中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在今天进一步探索近代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由于近代涌现出较多的教育思潮,本文仅择具有代表性的几个范例,进一步探讨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现代化的思考与行动,以及对中国教育研究的深远影响。

## 第二节

### 黄炎培与职业教育本土化的早期探索

#### 一、从实用主义教育到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思潮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化准备时期颇具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萌发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以后得到广泛传播,2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主要倡导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后改为韧之、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黄炎培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父母双亡。20岁起,即在家乡任塾师。21岁以府考第一名取秀才,三年后中举人,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从蔡元培受业,深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教育救



国思想影响。蔡元培对黄炎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首先,是蔡元培进一步激发了黄炎培的爱国热情,蔡元培经常通过谈话、选作文题目、指导学生阅读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黄炎培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是蔡元培引导黄炎培走上反清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第三,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也给黄炎培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与蔡元培一起积极倡导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致力于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思考与行动。黄炎培从办理与考察普通教育入手,以职业教育为归宿,实用主义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使黄炎培最终确定职业教育思想的是他对国内教育和国外教育的考察。在1914年,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黄炎培毅然向省长韩紫石辞去教育司长职务,开始着手教育考察。他很重视考察,认为这是改造中国教育的首要措施。“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sup>①</sup> 1914年春,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对皖、浙、赣三省的教育状况、社会状况和民生疾苦进行了详细考察。后又对鲁、冀、京、津等地区进行教育考察。通过考察黄炎培发现了教育与社会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业者也不能乐业等问题。同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大发展和由此造成的人才匮乏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经

<sup>①</sup> 《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过考察与反思,黄炎培最终认为找到了“病源”,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治病的“药方”。1915年4月,中国组织旅美实业团,赴美考察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黄炎培以旅美实业团编辑的身份对美国教育进行考察。在两个月内,他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中的50多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当时美国刚颁布了几个职业教育法令,职业教育搞得生机勃勃,这对黄炎培影响很大。许久以来苦苦探索的中国教育发展的出路问题,有了较清晰的答案。也找到了实用主义教育并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发展职业教育,才能沟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才能解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才问题。1917年1月,黄炎培又考察了日本、菲律宾的教育,搞职业教育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在此之前,黄炎培于1913年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曾提倡“实用主义”教育,他认为以前的教育都是“虚名的教育”,主张教育应当以“实用”为归,教育与学校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应当紧密联系。在旅美回来后,他在总结清末实业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实业教育之所以流于形式在于学校与社会的脱离、教育与职业的分。为此,黄炎培提议将“实业教育”改为“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络国内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此后几十年间,黄炎培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的。

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中,黄炎培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职业教育理论,树立了本土教育现代化的丰

碑。诸如,其一,“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并以此提炼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教育目的论。这一观点集中反映了黄炎培的世界观、社会政治观点和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黄炎培把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准备寄托于工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上。正如黄炎培所说:“所谓职业指导机关者,尚未为政府及社会所重视乎?在此情况下,势不能不希望政府,积极保护国内已有之实业,以图产业之振兴;同时倡办重工业,以立一切工业之基本。果国内产业发展,自易消纳多数职工,而职业教育,亦不难适应其需要而显著其效能矣。”<sup>①</sup>如前所述,黄炎培之倡导职业教育,是有感于中国社会生计之恐慌,百业之不改良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失学失业,试图通过推广职业教育来解决当时国家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讲到民生国计大问题,职业教育家常常提出这句话,也许有人认为‘大言炎炎’。其实在外国讲职业教育,诚哉求进步的意思较多,在中国怎能不把国计民生当大前提呢?”<sup>②</sup>“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体现了黄炎培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但是,把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仅仅停留在满足人的“求生、求群”的需要上,把教育仅仅看作是人谋生的手段,这是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曲解。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针对当时的中国社

① 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②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职业与教育》第100期。

会状况而提出来的。虽然他过分夸大了职业教育的作用,但却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其二,“社会化”、“科学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化,这是因为他看到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时刻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认识,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趋势而出现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本质特点,那就是职业教育必须开门办学,参加全社会的运动,适应社会之需要,完成社会现代化之使命。由此,黄炎培于1926年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大职业教育主义”,这种思想对中国教育理论界的影响至深至远。他在办学实践活动中,从专业设科、课程设置、招生人数、培养规格,直到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无不建立在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在黄炎培的倡导下,几十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形成了一种制度,定期邀请工、农、商、金融、教育各界专家集会,随时了解社会需求,征求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反映,对学校的要求,以期改进工作。黄炎培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sup>①</sup>

另外,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科学化,是指“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他把办理职业教育的工作归纳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物质方面,如农业、工业、商业、家事等各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确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都要力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一类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学管理方法组织职业教育机

<sup>①</sup>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职业与教育》第71期。

构的自身建设。黄炎培试图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职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上,指出要“因职业的各各不同,与人的天性、天才、兴趣、环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别种类,谁则宜某种,谁则不宜某种”<sup>①</sup>。黄炎培这种科学教育思想无疑为近代中国本土教育现代化之准备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他的科学化的办学模式对中国本土教育管理科学化的倾向开拓了新的方向。后来,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中专门设置机构研究科学管理问题,组织事务管理委员会。亲自编撰成《机关管理一得》、《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两书,目的就在于“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合一炉而冶之”<sup>②</sup>。

## 二、职业教育本土化探索的历史意义

在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黄炎培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国初年他首倡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引起了我国教育思想界的一场大辩论,形成了开风气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二是1917年以后,创立中华职教社,坚持不懈地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形成延续近二十年的职业教育思潮,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活动。他的贡献还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不到半年,黄炎培就积极筹办

① 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② 《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了《教育与职业》杂志,介绍欧美日本等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最新动态,首先在自己的事业中引进新的理论、制度、措施进行试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各项职业教育活动与欧美各国保持大致的同步状态。

第二,与欧美各国的职业教育把解决择业问题作为重点不同,中华职业教育社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首位,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中下层人民,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注意职业道德训练,致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在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范围上反映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点。<sup>①</sup> 这是最为难得可贵的,也是黄炎培对于中国本土教育现代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黄炎培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做出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他对办职业教育的决心,正如黄炎培在《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一文中所说:“第一,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为大多数贫民谋幸福。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贫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第二,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脚踏实地用极辟实的功夫去做。敬告同志,吾们大家下一决心,勿好高,勿沽名,勿投机,勿避难就易。第三,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须努力与民众合作。”黄炎培不仅极力倡导职业教育,并亲身到农村地区搞试点。诸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实验运动便说明了这一点。乡村教育思潮是中国 20 世纪 20—30 年代勃然

---

<sup>①</sup> 参见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2—135 页。

兴起波及面很广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最早看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就是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1921年,他在《教育与职业》第25期的“农业教育专号”上,发表了《农村教育·弁言》一文,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抑属于乡村为多乎?吾敢断言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sup>①</sup>

黄炎培等人看到中国实施现代化非提高国民素质不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住在农村,不重视普及乡村教育,只注意在城市中办学,那么,提高国民素质将是一句空话。正是看到这一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想实施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当时,有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他们在美国的教育实验理论影响下,幻想用办农村教育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生活,解决农村问题,稳定农村社会。因而,各种教育实验纷纷在农村出现。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在1925—1935年的10年间,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就有193个。尽管各自的观点、办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互有联系,一时间在中国农村形成了教育实验运动。<sup>②</sup>

由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26年6月开始,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创办乡村改进区。设总务、建设、农

<sup>①</sup> 《黄炎培教育文选》,转引自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第70页。

<sup>②</sup> 参见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709—714页。

艺、宣传、娱乐、教育、卫生 7 个部,实验期为 6 年。在教育方面主要是推行社会教育,开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指导改进农村生产。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张用职业教育来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正如乡村改进试验的设计师黄炎培所设想的那样:“我们的理想要把中国治好,无疑地须着重下级政治。最下级乡镇,次之县镇。”他还说,应“把乡村作国家的单位,把一乡村的改进,做全国改进的起点”。这种用乡村改进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进而达到把中国治好的理想,闪烁着深厚的爱国之情,为民之心;但是不从根本上触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彻底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仍属于社会改良性质。黄炎培的乡村改进试验由于政府不支持,再如抗战爆发后,许多实验学校停办,使他们的良好愿望和计划终究落空。

职业教育思潮从 1915 年前后兴起,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消退,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活跃了 20 年左右;特别是 20 年代前后的几年内,成为一种主流的教育思潮。它影响了:(1)1922 年学制的改革,取代了实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确立和加重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和比重,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向沟通,体现了升学与就业的双向职能;(2)教育实践活动,使全国职业教育机构迅速增加。据统计,1921 年全国有各类职业教育机构 531 个(当时称实业教育机构),至 1922 年增至 822 个,1923 年为 1194 个,1924 年为 1548 个,1925 年为 1666 个,1926 年达 1695 个。从 1918 年到 1926 年的八年间,职业教育机构数增加至三倍多。在这种情势下,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人员也迅速增加,职业教育实施的范围



也在扩大,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人数增长七倍以上;(3)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平民化、实用化和社会化,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民主、崇尚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特征。职业教育思潮不但影响着近代各种教育思潮,就是对今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刻的。

### 第三节

#### 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与 新教育体制和近代大学教育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商人世家,后家业中落,儿时仍为小康家庭,所以为蔡元培提供了能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早年蔡元培接受私塾教育,17岁时进学中秀才。青年时代曾任塾师,如同当时许多读书人一样,蔡元培在补诸生之后,继续沿着科举道路前行,1889年中进士,受职翰林院编修。由于蔡元培早年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认为诸子各家都有合理的理论和道理。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26岁的蔡元培再次去北京应试。他先在保和殿补复试,被列为第三等,接着参加殿试,在《殿试策对论》中,他提出对于各家学说,各派人物,不应该有门户之见,而应该兼容并蓄,各取所长。在他看来,“诸家之书,宗义不同,而观其会通,百虑一致,相反而相成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蔡元培的读书与以前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同,开始留心西学,涉猎有关介绍西方世界的文字以及西学著作译本。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著作使蔡元培获益良多,所以更增加了他学习西学的积极性。蔡元培供职翰林院的数年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其间两件大事深深震惊了他,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一件事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另一件事是戊戌变法失败,对于维新人士惨遭杀戮、通缉,他甚为愤慨,并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于是,1898年蔡元培毅然抛弃京职,南下兴办教育,办理新式教育,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特别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开始着手了爱国的教育实践活动,并进而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紧密结合。爱国学社等组织成为当时重要的革命秘密机关。蔡元培等创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革命团体。甲午战争的刺激,蔡元培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接触西学。后又出国留学,在1907年至1926年的20年间,蔡元培先后五次出国,留居国外几近12年之久。蔡元培被同时代的人誉为是一位“学贯中西”,能将中外新旧熔冶于一炉的学人。他的一生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中国近代的大学教育。

### 一、蔡元培关于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思想

蔡元培曾屡次到欧洲游学,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方面都远较中国先进,进一步激起了他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并鼓励青年去欧洲留学。蔡元培认为只有

把近代科学知识接受过来,才能改变中国闭关自守,无知自大的积习,才能使大大落后的中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由于蔡元培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培育人才,看成是救国的根本,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中西教育有较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从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中西教育思想,即现代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的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 1. 主张融合中西教育的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鉴于两点认识:其一,早在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时就明确说:“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sup>①</sup>。这一提法的依据是基于当时的时代需要。从当时世界历史背景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协约国的胜利在蔡元培看来是其“互助”的结果,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更需要“互助”精神,因此,文化教育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蔡元培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指出“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sup>②</sup>。这是蔡元培通过认真审视、考察中西文化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趋势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立论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主宰了中国几千年,这种旧文化已经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甚至产生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就必然需要一种新的不同的文化来撞击,所以,接触和融合欧美文化乃是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迫切需要。其次,从西方文

<sup>①</sup>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8页。

<sup>②</sup>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明的发展来看,文艺复兴时代,阿拉伯和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影响也很大。近代西方大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杜威等,他们的思想“几乎没有不受东方哲学影响的”。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向世界传播的价值,现在也证明,西方学者极想知道中国从前的文明,他们一直在收集中国的典籍,他们希冀在东方文化中寻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提供了中外文明沟通交流的机会。此外,蔡元培还指出:“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sup>①</sup>

其二,要看到中西教育各有利弊,要通过比较鉴别,以理智的态度,深刻分析二者的各自特点,要相互借鉴,扬长避短。蔡元培从三方面论述过这一思想:首先,从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目标来看,蔡元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古代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使少数人毕生攻读,使他们能顺利通过朝廷举办的各种考试,而考试则是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sup>②</sup> 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只在于为朝廷培养科名仕宦之材,教育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对个人来说,一朝金榜题名,便可荣宗耀祖,落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与近代西方教育比较,可以看到西方教育则从社会发展和受教育者本体出发,重在发展学生个性和培养多方面智能。西方教育一直致力于教育机会均等化与民主化,普及大众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知识水平为鹄的。其次,从教育内容来看,中国封建教育的内容,一切为“应试”而设,“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但西方教

①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页。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育的内容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sup>①</sup>,是职业的、科学的和日常生活的知识技能。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教育内容正是导致一个民族创造力的差异(为什么古人的四大发明能漂洋过海,而现在我们却不能发明值得西方仿效的呢?),也是导致中西社会发展快慢悬殊的重要原因。蔡元培提醒人们:“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sup>②</sup>最后,从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上来比较,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也是强迫被动的教育;而近代西洋教育,“尚自然”、“展个性”,“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sup>③</sup>。

蔡元培在对比中西教育时,基本是本着一种平和公允的态度。既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的教育,对优秀遗产也给予充分肯定并予以发扬光大,积极向世界传播。在充分肯定西方教育的同时,蔡元培也保持头脑冷静,采取辩证的思维方法,加以甄别,指陈其弊。例如,蔡元培曾多次深刻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所推行的极端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危害。他指出,极端国民主义,易使学生养成尊慢己国、蔑视他族、蹂躏人道、增进兽性之习惯,这是少数强权者的妄念,根本不是群性之本义。在清楚中西教育之利弊后,蔡元培欲以身心和谐发展的人格教育来补正西方极端实利主义教育,这正是他

①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② 同①,第69页。

③ 同①,第68—69页。

融合中西教育思想的体现,其见解是十分精当的。

## 2. 在学习西方教育时,也应向世界介绍中国教育。

在蔡元培看来,学习西方教育的捷径在于:有更多的留学生去西方直接把有用的学术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以及教育经验和方法接受过来,做到事半功倍。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要“互相师法”、“交通有加”、立足本国,去粗取精,才能达到创造出中国特色新教育之目的。由此可见,蔡元培是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消化西方教育而不被其同化的思想,符合中华民族自身利益,也合乎世界文化发展规律。蔡元培经常会不失时机地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以及我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发展和成绩。这就是他所做的“输入与输出并举”的思想。

## 3. 融合中西教育,创造中国的新教育。

蔡元培认为,融合中西教育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又要兼采西方教育的长处。比如在大学教育方面,蔡元培说“大学教育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sup>①</sup>。应从三个方面予以参酌兼采:其一,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科学。其二,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其三,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以及“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sup>②</sup>。在借鉴西方各国近代教育改革经验,进行融合创造之时,蔡元培认为要正确处理好三个

<sup>①</sup>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

<sup>②</sup>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7页。

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学与术的关系。蔡元培认为，西方之所以发达，就因为以学术为中坚。“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sup>①</sup>。蔡元培学与术并重的思想是他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并自始至终贯彻的教育思想。

其次，个性与群性的关系。蔡元培反对极端的个性教育和极端的群性教育，主张个性与群性要协调、适度发展，而不能有所偏倚。这一思想是蔡元培融合了中国古代教育强调人文素养如道德、义务等，西方教育崇尚自然主义而注重个性发展等优点，同时又剔除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军国主义等弊端后，提出个性与群性之教育思想的。

第三，身心发展的关系。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只强调用脑而忽视全身训练，而西方教育又太注重全面训练而忽视了人的心性修养，鉴于此，蔡元培认为，新教育在于“深知儿童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sup>②</sup>，使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不能有所偏废。

蔡元培对于当时中国教育界学者或者要固守本土学问或者全盘西化，特别是有人要靠传译西学改变本土教育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不能真正促进本土教育发展的，结果还会使本土特色丢掉也只能学到西方之毛皮。因此，蔡元培指出：“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sup>③</sup>

①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2 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74 页。

③ 同①，第 15 页。

这就是说,学习西方教育,融合中西教育之长,其目的是要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教育,这种创造才是正途。从蔡元培如下的五育并举等教育理论与大学教育实践中都可看到他的这种“融合与创造”的言行和业绩。

## 二、蔡元培关于新教育的理论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是中西教育思想结合的集中表现。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方针。其内容是:

(1) 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而中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sup>①</sup>。这就是说,要推行军国民教育,使全民皆兵,才能打破封建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

(2) 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指出: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在武力,而更重要的是财力。而中国地下宝藏尚未开发,各种新式企业尚少兴办,人民失业者和无业者很多,国家贫穷。实利主义教育,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所以实施实利

<sup>①</sup> 《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其目的都在于“强兵富国”的需要。

(3) 公民道德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兵可强,国可富;但是公民无道德,则不免智侵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所以“必须以道德为根本”,教之公民以自由、平等、博爱。他还用中国古代孔孟的传统道德来论证之,认为自由者,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古者盖为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即“古者盖为之恕”;博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即“古者盖为之仁”。同时,蔡元培企图对传统道德教育注入西方先进思想之成分,赋予新内容,使其更有生命力。这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东西文化结合”主张的一次实践。

(4) 世界观和美感教育。这两者都被蔡元培视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他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方面。政治家以追求现象世界的幸福为目的;宗教家以追求实体世界为目的,“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家“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sup>①</sup>。这就要进行世界观教育。怎样进行世界观教育呢?在蔡元培看来,只有通过美感教育,即美育来实现之。因为“美感者”,它介乎现象与实体世界之间,可以起“津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性的最大自由和发展,并逐渐和

<sup>①</sup> 《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实体吻合”，而获得意志的完全自由。蔡元培主张应以美育代宗教。他对宗教有一种嫉恶如仇的情感，认为宗教对人们精神生活的麻痹，可使人们丧失积极进取的斗志。因此，蔡元培认为，应当在学校以美育代宗教，在家庭以美育代宗教，在社会以美育代宗教。他的这些思想由于超出了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所以并不能在实际中实现其理想。

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或为中心，提倡人的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这种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反映了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巩固政权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潮流。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正因为如此，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创建新教育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石。

当然，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也存在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首先，他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这是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将世界观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他对教育的看法，所以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隶属于政治，而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超轶

于政治,这种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其次,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sup>①</sup>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着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然而瑕不掩瑜,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是值得我们在今天进行认真研究的。

### 三、蔡元培与教育独立思潮及收回教育权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各外国教会集团进一步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教会已发展成一个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并有各种专门教育的教会教育系统。据统计,这时基督教教会共办有各级各类学校7382所,学生214254人,天主教教会共办有各级各类学校6255所,学生144344人,两者共有学校13637所,学生358598人。<sup>②</sup>其中,由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增加更为迅速,所有的教会学校无视中国政府,脱离于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了中国教育领域的独立王国。他们并不是想通过教育使中国步入现

<sup>①</sup>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页。

<sup>②</sup>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38页。

代化之路,而是通过教育宣传宗教,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和精神渗透,实行奴化教育。这种严重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发了收回教育主权的教育独立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代表。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蔡元培被电召回国担任首任教育部长。由于蔡元培在国外接触到西方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在人性与教育上,这种思潮主张人的活动和发展应是独立和自由的。这些思想使蔡元培具有了对传统中国人性观批判的武器,正是自由与独立的因子,孕育出了蔡元培等同时代先哲们的教育独立思潮的萌芽。

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①教育行政独立。这是蔡元培平生办教育的理想。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蔡元培推行大学院、大学区制,旨在为教育行政谋取相对独立的地位。在他看来,改掉教育行政机构中清末所遗留的衙门作风,冲掉教育行政官员的官僚习气,必须加重大学院的学术色彩,最终实现以学者为教育行政之指导,以“学术化代官僚化”。②教育经费独立。蔡元培认为,教育经费独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教育经费的独立,不仅影响到教育成效的高低,并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百年大计。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筹措经费,谈何容易,蔡元培的这一主张也就无法实现。③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蔡元培倡导学术独立的内容是:学位独立、职称晋级制度独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学院的自由。

教育独立思潮原由经费问题引发,后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反对军阀政客摧残蹂躏新式教育的运动,开展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宗教垄断中国教育的反击。蔡元培试图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在国民政府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教育独立思想也揭示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与教育独立思潮同时期的产物,滥觞于蔡元培、李石岑关于教育独立之议,主要是针对西方宗教以文化侵略的方式控制了中国大多数学校,教育主权受到了严重侵犯。在这种情况下,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全面展开。1922年3月,由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要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十一次大会,讨论“如何宣传基督教与现代之大学生”、“学生生活基督化”等问题,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反对。同年3月9日,上海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开始向教会学校发动攻击,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揭露了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和教会利用学校所进行的文化侵略。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会上发表演说,他重申:“(1)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2)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3)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他强调说:“我的意思,是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入教育的。”胡适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他在1922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年会上,提出了“凡初等教育(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的提案,将反对教会教育提上了规划教育发展的议程。1923年,余家菊在《教会学校问题》一文中,从国家主义教育的立场出发,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

口号。<sup>①</sup>

1924年,非基督教育运动演化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此后全国形成了一个反对教会教育的斗争浪潮,参加这一广泛运动的主要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有共产党人,亦有一些持国家主义教育观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如陈独秀、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杨贤江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及时推动和指导了运动的进行。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主要内容有:(1)外人办学要遵守中国法令;(2)教会学校要由中国人任校长;(3)学校董事会里,中国董事应占多数;(4)不得传播宗教;(5)课程要以部颁为标准。<sup>②</sup>这样,波及全国达数年之久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终于使教育在名义上独立于宗教了。

当然,要彻底收回教育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从北洋政府的法令来看,就具有明显的妥协性。但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却是教育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它的意义在于,从文化方面反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夺回了教育主权。教育救国与捍卫人权等运动浪潮迭起,构成了寻找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的道路。

---

①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662页。

② 同①,第663—664页。

#### 四、蔡元培大学教育的思想与业绩

蔡元培一生中最令人瞩目的教育业绩就是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博采众议,厉行革新”,将封建官僚习气很浓厚的旧北大,改造成为一所思想活跃、充满生机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颇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教育理论,建立了全新的北京大学,对近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自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按照他把北京大学办成德国柏林大学那样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的教育理想,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各种改革活动,其改革成效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学生观念上的改革。经过考察,蔡元培认为封建陋习浓郁的北京大学最“著名腐败的总因”,是学生进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仍然沿袭着科举时代的“读书做官”的思想意识。这种风气不除,北京大学就会继续腐败下去,所以第一要改革的就是这种思想和观念。1917年1月9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他向学生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抱定宗旨。“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规。”二是砥砺德行。蔡元培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

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在社会树新风、立正气靠的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三是敬爱师友。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相处,尤应互相亲爱、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互相鼓励。蔡元培向学生提出的三点希望,他首先以身作则并身体力行,在他的带动下,北大师生为扭转北京大学旧风气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蔡元培在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在每学年欢迎新同学的开学典礼上,他总要反复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这一思想,对于改革学生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深谙大学之道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他首先从聘请文科教员开始,而注意的重点在于选聘一位好的文科带头人。有人向他推荐陈独秀,蔡元培本来就对陈独秀有一种难忘的印象,故不惜辛苦数次诚聘陈独秀。1917年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其时距蔡元培第一次晤面陈独秀才半个多月,他自己到北大视事甫九天,这充分表明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信任,以及对人才的渴求。在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先后聘请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到北大执教或兼课。其中李大钊于1918年1月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8日,经北大评议会讨论决定,图书馆主任为教授,李大钊便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大学讲坛上系统地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许多社会名流、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如胡适、梁漱溟等到北大任教,颇有典型性。总之,在蔡元培的积极引进下,当



时北大文科教员中既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为骨干的革命阵营,同时也包容了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陈汉章、陈介石等这样一些国内知名的旧派学者,真可谓极一时之选。理科也像文科一样积极广聘社会知名学者。在“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也不畏风险和阻力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教员,包括外籍教员。经过整顿,北京大学教师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文、理、法各科不仅人才荟萃,集中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而且教授队伍明显年轻化。正是这支生机勃勃的教授队伍,成了蔡元培进行各种改革赖以依靠的支柱。

第三,提倡和助成各种社团,鼓励和支持创办各种刊物。蔡元培认为,旧北大的学生不仅在讲堂上学不到东西,而且在讲堂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与学校以外,竟为不正当的消遣”<sup>①</sup>。这种现象如不改变,必然会影响北大学子的素质和学校的声誉。有鉴于此,蔡元培积极倡导成立各种社团,鼓励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北大成立的各种社团有27个,分别是: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阅书报社、学馀俱乐部、地质研究会、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美学会、技击会、体育会、静坐社、北大教职员会,

<sup>①</sup>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9页。

以及消费公社和学生储蓄银行等等。在各种社团纷纷成立的同时,蔡元培还鼓励、支持创办各种刊物。除学校办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和学术刊物《北京大学月刊》之外,北大师生也都办刊物,举其要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读书杂志》、《国故》、《新潮》、《国民》等。<sup>①</sup>正是丰富多彩的校园培育了高素质的北大学人,高质量的北大学术水平和办学水平。这些经验与做法同样值得今天北京大学继承、借鉴与发展。

第四,倡导和推行平民教育。蔡元培一个重要思想是主张在教育机会面前人人均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他出任北大校长期间,他仍在考虑如何实行教育普及。他除了改革北大招生制度,坚持以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出身贫寒,而学业优秀的平民子女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外,还在北大园内直接办起了平民学校,诸如校役夜班等。在积极提倡平民进北大受教育的同时,蔡元培也热情鼓励北大学生走出校门,为平民服务。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假日,在北京城内及郊区各地作讲演,不仅有利于把文化知识普及于平民,而且对于促进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蔡元培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所以他积累了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新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sup>①</sup> 金林祥著:《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

(1) 确定大学之宗旨或性质,这就是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在办学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是对数千年来中国封建办学观念的一次重大冲击,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的。当然,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文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提倡和扶植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还应该指出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传播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蔡元培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应该加以研究。所以,蔡元培同意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予支持。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北大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者不乏其人。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很明显是受到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同时,他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营养。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经验无疑是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的典范,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深远的。

(3) 沟通文理的思想与主张选科制。在文理分科实行后,蔡元培看到人们有着“重术而轻学”的思想观念,看到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他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及“废科设

系”。蔡元培在当时已意识到学科之间“彼此交错之处甚多”<sup>①</sup>，因此在北大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在主张文理沟通的同时，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提倡采用选科制。这种制度通常与学分制（又称单位制）相联系。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可自由选择占一定比例的选修课程。选修课程既可以是本系开设的，也可以是相关学系开设的。这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进行学习，由此也培养了一大批文理兼通、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建设和革命的栋梁。当然，蔡元培实行选科制，很明显是受到美国影响，但是他不生搬硬套，也不牵强附会。而是根据本土情况，在具体内容上突出本民族的特色。这是蔡元培在处理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问题上的又一杰出之作。

（4）在大学内部建立教授治校的体制。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管理的基本思想。他是国内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发起人，他的这种思想早在执掌北大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到北大后，便着手实行其主张，建立了教授治校的体制。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管理体制，防止校长等少数人主观武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先生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当然，蔡元培提出的教授治校主张和具体做法更多的是来源于德国大学管理的民主精神和管理经验。他是借鉴德国大学的管理经验，建立起适合本土大学特

<sup>①</sup>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31 页。

点的教授治校体制。

综上所述,蔡元培在改革封建教育,特别是改革北大的实践中,认真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中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特点,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大学教育理论,它涉及学校性质、办学原则、学科设置、教学制度、学校管理等大学教育的各个重要方面。具体来说,蔡元培十分重视课程设置。他一贯主张由各系教授会民主决定开设课程项目。在课程内容上必须改革旧的内容,充实或增加适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课程。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用“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蔡元培主张要对外国学术文化能够吸收消化,为我所用,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应以“我为主体”,切忌“囫圇而吞之”。蔡元培虽然十分重视外国语课程,但他反对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严复主持北大校政时学校规定各项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演说大都用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人苦不堪言,这虽对学习外语收到一定效果,但滋长了学生盲目崇外的心理。蔡元培到北大后,竭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规定开会一定用国语,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上用外语讲授外其他课程必须使用本国语言讲授。这种做法无疑培养了青年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就是在今天这种做法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难怪现在有许多老学者(他们也曾留过洋)看不惯一些出国归来的青年学者,开口洋文,闭口洋词,既无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无融合中西理论之创造性,而且喜欢在理论上搞一些“夹生饭”,使人不知所云。

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十分珍惜的。他在中国文学

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在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研究。在这种弘扬国粹的精神下,北大文科教学方面集中很多造诣很深的知名学者,开设许多独创性的课程,除李大钊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钱玄同的《文字史》(声韵)、刘复的《语音学》,吴虞的《文学名著选》,刘师培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黄节、沈尹默的《诗》,马叙伦的《庄子哲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陈启修的《现代政治》,陈大齐的《认识论》,陶孟和的《教育社会学》,马衡的《金石学》,周贤的《国际法》,马寅初的《货币》、《银行》等,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普遍受到学生的欢迎。为什么蔡元培在外国十几年回来没有忘记传统,这正是因为他有着根深的国学基础。他之所以学贯中西并亲自融合中西教育思想,就在于他想创造性地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走出一条自己的教育现代化道路来。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正如今天人们所共识的:他是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杰出代表;是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奠基人;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开拓者;是致力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卓越先驱和伟大的教育家。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伟大教育家,中国共产党曾给予崇高的评价,称他“为革命奋斗四十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sup>①</sup>。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sup>②</sup>。

① 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3月12日。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

## 五、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清朝光绪二年春清明节日(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穷塾师的家庭。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野蛮侵略下,天津被迫对外开放,社会历史进程向现代化突飞猛进。张伯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形成了他最初的社会视野。伴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脚步,张伯苓一生的教育实践,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从19世纪末从事教育始至1919年南开大学创办,为初创阶段;(2)从南开大学成立至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为兴盛阶段;(3)学校南迁在重庆、昆明等地继续办学至1949年,为曲折发展的阶段。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其基本定型大体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是因为,从其办学过程看,形成了四部制的系列化的教育体系;在思想理论上,对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发展;在办学实践上,明确制定了根据本国国情发展大学教育的方案,对中学教育教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述如下。

### 1. “轮回教育”事件与教学改革。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形成和深入,都是与其对西方教育认识的深入和实践分不开的。从最初的完全效法到有选择的学习和接受,可以看到张伯苓教育思想日臻鲜明和成熟。20年代中期,广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必须适合国情的问题提出强烈的要求。他们从切身体会中感觉到,美国式的学制只注意狭

义的机械式的人才培养,教师只知道往学生脑袋里填东西,“把有希望的青年训练成一种转贩知识的被动的工具”。他们对“大学教育是否应当影照其本国之文化与需要而定教育方针、课程设备”,公开加以讨论,要求“本校当局能多多根据本国的国情,定出一个较为中国化的大学学制”。1924年11月,一个名叫宁恩承的学生以“笑萍”的笔名在《南开周刊》上发表了《轮回教育》一文,结果把师生间对学制的不同观点引向激化,酿成了一次风潮。该文认为,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按着两个圈子转来转去。一个圈子是自中学到大学,自大学再转到中学去,即中学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到中学去当教员。另一个圈子是高一等的圈子,即:大学毕业,留学,留学回国,当大学教员,教学生出国留学,如此循环。<sup>①</sup>

《轮回教育》事件使张伯苓进退两难,调处无方,只得离校而去。之后,张伯苓进一步考虑教育改革问题,逐渐形成了教育应当使学生与社会接近,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观点。通过学校教务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社会观察委员会,并规定六项社会视察目标:①培养学生实际观察能力;②谋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联络;③注重客观的事实作为学校研究的依据;④作将来课程改造之科学的基础;⑤引起学生兴趣做将来择业之准备;⑥将研究视察结果,报告社会,供将来解决问题时之参考。1927年,张伯苓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中学暑期召开了改革讨论会,强调“以学生为主”。大

<sup>①</sup> 梁吉生著:《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29页。



学教务会议也作出决定,不再使用美国原版课本,要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于是,一批很有本土特色的教材脱颖而出。从这些做法中可以看出,张伯苓自“轮回事件”后,对西方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教育方针如何才能不至于空虚,救国目的如何才能不至于妄谈,有了新的思考。<sup>①</sup>

## 2. 欧美之行的教育与社会考察。

为了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张伯苓决定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考察。张伯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考察美国教育和社会情况上。当时美国正处于20年代经济相对稳定最繁荣的时期,美国优裕的物质生活给张伯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通过中美社会之比较,根据他的观察,认为好的国家是“富”而“强”,不好的国家便是“贫”而“弱”。我们中国便是贫而弱的国家,人民的一切苦楚都基于贫弱的原因。贫的原因,第一便是工业的缺乏;第二是农民所占土地太少,农业不能尽量发展;第三便是我们中国的人口众多。针对这种情况,张伯苓认为,富强是中国应当解决的最大问题,“总起来说,要切记这三项:第一提倡工商业,第二移民边界,第三节制生育”。张伯苓从发展生产力出发提出的富国强民主张,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的,比“教育救国”的主张前进了一步。张伯苓对欧美教育的考察是与社会考察相联系的。他在美国四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一般性参观哈佛、耶鲁等大学,更多的是与教育家、知

<sup>①</sup> 梁吉生著:《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名社会人士一起探讨问题,具体了解他们的教育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怎么解决西方国家的通病。经过九个月对欧美教育的考察,张伯苓对西方教育观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认识到教育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教育。他说,过去我研究西方教育,多注意学校的组织及其外形。现在不应如此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联系”。

第二,对欧美的长处、短处,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找到了学习西方的正确途径。他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样样都好,恨不得样样都搬到中国来。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不然,觉得美国东西有的可以搬到中国来,有的不能搬的,勉强地搬只会有害而无利”。他还说:“我们取法的,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方法和民治精神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形而加以选择。”

第三,认识到中国教育的根本弊端是不适应国情的需要,制定教育宗旨,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他说,教育不振固然为中国之病症,教育不能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之大病。因此,“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

第四,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要求,“革新运动必须‘土货化’”,“此中国革新运动应有之新精神,亦南开大学发展之根本方针也。”张伯苓正是从欧美实地考察后,逐步

形成了他的教育观和办学方式,真正找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他的教育思想,这一进步不仅是他学习欧美后的理性认识,更是体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必然。

### 3. 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概括地说,张伯苓从国外归来后的教育思想就是:走切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实际的办学道路,培养具有科学知识和现代能力的人才。张伯苓把中国放到世界大范围中去考虑,教育的目的要促进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同时要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推陈出新。他的教育思想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性,容纳中西文化的开放意识,联系中国国情、改造社会、经世致用的实践倾向,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当时的“全盘西化”论截然不同。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张伯苓明确提出了“允公允能”的校训,要使南开培养的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提出的“公能”校训,真正融合了中西教育思想于本土化的应用之中。由此更坚定了张伯苓力行“土货化”的教育方针,他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写道:

以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译本,最优者亦不过参合数洋文书而编制之土造之洋货。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就社会科学论之,此中弊端,可不言而喻。社会科学,根本必以其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行故

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主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自然科学稍异,然不能谓洋货均能适用,更不宜为中国应永久仰给于洋货。地理、地质、气候、生物诸学,无不对环境而言。中国人在利用中国之天然环境,非有土产的科学不为功。此就科学之实用而言,但实用科学倘无锐进的理论科学为后盾,其结果不异堵源而求流。且今日国人思想之急需,莫过于科学精神与方法,故吾人可断言: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报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这个发展方案所提及的“土货化”不是借复兴“东方精神文化”来反对外来文化,而是坚持西方先进科学精神与方法,建立关于中国问题的科学知识,培养中国问题的科学人才。这一教育观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这个方案中,也落实到他的教育实践中。30年代,张伯苓坚持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探索一条能适应中国国情、紧密联系社会,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道路,是卓有成效的。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成为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齐名的著名学府。南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张伯苓在那个时期奠定的基础,特别

是大学培养“现代能力”之学生与大学教育试验等方面,张伯苓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功不可没。他在近代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归纳如下:

第一,创造性地构建了近代私人教育体系,使私人办学这一传统形式得到更新和改造,注入时代活力,转化为近代私立学校,并成为适应中国近代新经济结构的一支重要的、活跃的教育力量。张伯苓是近代私立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第二,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对西方教育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所做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提供了范例。

第三,首创南开模式,推进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发展。南开模式是以学习欧美教育为特征,以切合中国国情为根本的完整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育模式。

从如上业绩可以看出,张伯苓教育思想具有民族性、致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张伯苓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办学阅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来看,他一生有过无数次关于教育的演讲,也较少深沉的理性升华,而流于浅近。近代教育家如果都能留下他们对教育的理性思维和哲学思考的遗产,就会使我们今日教育理论建构有着更加坚实的“土货化”根基。

## 六、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生于直隶(今河北)天津。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

诵。1905年,15岁的梅贻琦进入天津南开学堂,成为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高足。1908年,梅贻琦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就读。恰在这一年,美国决定把在1900年侵略战争中分得“赔款”的“多余”部分“退还”中国,作为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次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留学生的招考事宜。8月在北京招考首批“直接留美生”。这时梅贻琦在保高攻读刚满一年,便毅然投考。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中取。后来,梅贻琦抵美进入东部的吴士脱大学(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现在通译为吴斯特理工学院。梅贻琦在该校选供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夏,梅贻琦从美国吴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一种专为奖励大学生的制度,获奖者由各大学推荐,奖品为一金质钥匙,故称“金钥奖”)。在留美期间,梅贻琦还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这对增进阅历,锻炼办事能力,均有裨益。在美期间加入基督教会,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梅贻琦1915年春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既尽乡士之谊,又尽一位虔诚教徒的义务,9月,应清华周诒春校长的礼聘,莅校执教。梅贻琦到校后,很快便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博得了学生的好评。除正课外,还积极担任各种科学讲座和业余活动的辅导或指导。这使他能进一步了解学生的情况和大学的管理。在此期间,梅又出国访学,这些经历为他今后从事校长工作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1931年10月,南京政府发表梅贻琦为清华校长的任命。梅于11月底回到国内,在南京稍事停留,便于12月3日北上

莅校就职。在清华期间,他坚持着“民族的和现代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发扬光大时,又无不赋予浓郁的“梅贻琦教育思想特色”。

综观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有三个很明显的“本源”,即:①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②欧美近世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思想;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学院式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

梅贻琦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或称“三大支柱”),即:①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这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博雅思想,使他在30年代短短数年内,培养出各个领域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造出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②教授治校。梅贻琦治校采取“教授治校”或“民主管理”,其思想来源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和前人治校的经验。梅贻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教授治校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是他却将“教授治校”在清华大学制度化了,促进了清华大学民主制度和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③学术自由(或称“自由探讨之风气”)。在梅贻琦看来,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的。另外,梅贻琦高度重视教师在培育人才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核心之一“大师论”。师说的主要内容包括:知、情、志——培育“全人格”的三个基本环节;“以善先人”之教,即善于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引导学生获取知识;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即师生关系应当建立一种“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关系。

从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与思想来源中可以看到,梅贻琦正是贯彻了蔡元培融合中西之教育理论,形成独具特色的适合本土本校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特别是梅贻琦通才教育的思想,其影响至深至远,直到现在,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仍然是以博学多才而见长的。这与梅贻琦时期奠定的教育基础和他所树立的风气是分不开的。他的教育思想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继承和发展的。

## 第四节

###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他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迎着历史的风雨浪涛,不断求索,不断奋进。他一生以教育为职志,从“五四”时期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夕,他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把从事教育革新与政治革命相结合,把教育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努力奋斗;他坚持教育试验,勇于改革旧教育,探索新教育,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一系列教育主张,为我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陶行知先生从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转变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战士。



毕生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开拓、创造,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无论历史曾怎样评价他,他都无愧于“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光荣称号,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加以研究、整理、继承与发扬光大的。

陶行知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行知,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距歙县城西约七华里)。陶行知的童年、少年时期,正处于清末甲午战争前后。陶行知自幼聪敏好学,因家境贫寒,只得随父学识字,后遇良师,因其颖慧,被免费开蒙。以后曾就读于多位名师门下,从而打下坚实的国学功底。1910年秋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秋赴美留学,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开始从事教育实践活动。

1917年到1935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基本思想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基本来源于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sup>①</sup>。但是,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和积极办晓庄学校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sup>①</sup>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39页。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的教育活动中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其推向新的阶段。

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到后期发展阶段,他已经由一个改良主义“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在国统区的民主革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与解放区徐特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并称为中国教育革命史中的两颗明珠。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又称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在批判中国旧教育、洋教育的基础上,吸收中外优秀教育成果,经过不断探索、试验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它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部分构成,这三部分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各个方面。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反思和对洋化教育的批判中,建立在新教育的实验与研究 and 总结中西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把他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批判作为探讨他的生活教育与实践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深入理解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质。

## 一、反对“因袭陈法”与“仪型他国”， 主张“自新”、“常新”、“全新”

“五四”时期，各种新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领域的封建复古守旧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工作时就已经开始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动向，发表了许多文章，极力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他说人们常说“教育救国”，但不革新教育“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sup>①</sup>。

教育的革新和因循守旧是对立的。陶行知指出：“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然今昔时世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殊。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方枘圆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不除“因袭陈法”之弊，就不能“求教育之刷新进步”。

中国近代新教育产生以来，介绍外国的教育学说和经验，这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变革是必要的。陶行知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包括杜威的教育学说。但是，在中国如何对待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流派的学说生搬硬套的后果是什么？陶行知认真总结新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时新教育运动的倾向，结合实际尖锐地批判了“仪型他国”——照搬外国的弊端。诸如近仿日本远效德国，继学法国、美国的倾

<sup>①</sup> 《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 页。

向,既造成了本土教育特色的丢失,又没学到能适合本土发展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为此,陶行知认为,照搬外国未必就是“新的”,亦未必能使中国教育革新。因为外国之发明多经长时间的试验,然后公布、外传。经过辗转传述,往往不得其真;“即得真相”,“多需时日,恐吾人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不仅如此,“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故可以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比比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

陶行知上述批评一针见血。当时中国教育是一种“形新而实旧”,主要的弊端就在于保守复古和照搬外国。也就是后来他进而批判的“老八股教育”与“洋八股”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要“革而新之,其惟试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陶行知不但有选择地介绍西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此后逐步深入教育实际,亲自参加探索中国教育的改革实践,调查统计、实验研究,为中国教育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什么叫“新教育”,陶行知用六个字概括了其三个层面的含义,即“自新”、“常新”、“全新”。第一层“自新”,就是说中国新教育当然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他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那是终究无所适从。所以新学的第一个意义要‘自新’”。<sup>①</sup>此后,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以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求来

<sup>①</sup> 《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创新。这是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后来,他在自编教育文选《中国教育改造》的《自序》中说:“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sup>①</sup>。陶行知就是这样强调中国教育的“自新”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新教育”的第二层意义是“常新”,这是因为“一切皆流”的缘故,“今日新的事,到了明日未必新;明日新的事,到了后日又未必新”,教育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相应的进步与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要,教育只有保持“常新”,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新教育”的第三层意义是“全新”,他认为“新教育”“不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还要有精神上的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的新教育。他论述了教育目的、方法、课程、教师、学生都要革新,办成新的学校,全新的教育。积极探索中国民主的、科学的新教育,<sup>②</sup> 培养“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sup>③</sup> 的教育目标。

## 二、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主张生活教育

陶行知所反对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中国封建的“老八股教育”,同时反对“穿着洋装的老八股”——“洋八股教育”。“老

① 《陶行知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0 页。

② 同①,第 122 页。

③ 《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八股教育”和“洋八股教育”，是在我国近代教育的演变中产生的。中国封建教育是以科举考试为主导形成的一套“老八股教育”的制度和办法。在这种制度下，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形成了对士人思想才能的严重束缚。在老八股教育下，“伪知识”抹杀了真知、消磨了“民间天才”。只有少数人通过科举选拔成为统治阶层的官吏，大多数人名落孙山后，成为没有真正本领找饭吃的人，就去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而那些“教书先生”又开始了“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成为“废人”了。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深刻揭露了封建教育的本质。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统教育日益显出空疏无用、陈腐落后。于是新学运动“废科举、兴学堂”。书院变成学校，山长改为堂长，学堂增加了各种科学的教科书。但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并未改变，学堂里标本、仪器只供来宾参观，学生依然死读新的教科书，毕业于各种学堂的学生成为洋秀才、洋举人……旧功名翻译为新功名。“老八股教育”与“新八股教育”合流。陶行知说：这不是洋装的老八股吗？穿洋装的老八股就是“洋八股”。它和老八股同样是无用的东西，既不能教人制造，也不能教人创造发明。他们只能给人“伪知识”、“死的知识”。陶行知面对这种现状发出了呐喊，“如果大家还不觉悟，只有死路一条”。要痛下决心，放弃一切“固有”的和“新来”的“伪知识”，“不要再把伪知识穿于后辈”，要与“青年共同努力去探求新知识的源泉”。为此他预言：“20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新知的民族。……东西两半球上也没有中华书呆

国的地位。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sup>①</sup>”。

陶行知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出发,认为:教育为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首先在于教育教会人生产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而传统教育、洋化教育脱离生活,首先是脱离生产劳动。所以,教育必须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陶行知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斗争中,可以说经历了从现象到本质、方法到方向、部分到整体,从教育理论的批判到政治的批判,通过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后,逐渐形成了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

### 三、生活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陶行知把其基本内容概括为: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为要避去瞎做瞎学瞎教,所以提出“在劳力上劳心”,以期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

<sup>①</sup>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觉之进步。“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去。……总之，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上文正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纲领性陈述，包括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组成部分。1934年他写的《什么是生活教育》一文，给生活教育的确定定义是：“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的，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1936年他写的《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说：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一系列命题。

### 1. “生活即教育”的本体论。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他是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鸟笼式”的“假生活”。指出，人们不再耐烦地把学校变成社会的缩影，他要伸张到大自然、大社会去活动。陶行知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或者说“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sup>①</sup>。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可见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完全摈弃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鸟笼式”的“假生活”，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为一炉。

“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

<sup>①</sup>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33页。



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其核心内容就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生活与生活摩擦才能起教育作用。”那么陶行知所描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陶行知认为:“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譬如一粒种子一样,它能在不见不闻的地方发芽、抽条、开花,从动的方面看起来,好像晓庄剧社在舞台演戏一样。”<sup>①</sup> 由此看来,陶行知所说的“生活”是广义的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称。因此,人类生活的变化和自然界的变化都应使生活教育内容不断更新。同样,教育有顺应生活的,也会改造生活,这就是陶行知所提出的“教育改造生活”,意思是教育并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教人、化人来改造生活。关于教育与生活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sup>②</sup> 这种阐释表明了“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构成了生活教育理论的本体论或中心论。

## 2. “社会即学校”的大教育观。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继承和发展。陶行知认为“学校即社会”未摆脱

<sup>①</sup> 《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9 页。

<sup>②</sup> 《陶行知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2 页。

鸟笼式的教育。“学校即社会,就好像一只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从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引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要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sup>①</sup>看来,陶行知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变成了“社会即学校”,使学校教育面向大自然、面向生活,形成真正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先后亲手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就是以新型学校形式体现出他的“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但是陶行知过分夸大了社会对学校的作用,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受到影响。

### 3. “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是对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是在反传统教育,实行教学改革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一过程明显经历了“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教学合一”、“教学做合一”三个阶段。其中“教学合一”有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对“教学做合一”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从陶行知对“教学做合一”所作出的阐释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旧教育注入式的“教授法”而提出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传统的教授法以“教”为中心,完全不管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以“教”为中

<sup>①</sup> 《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1 页。

心变为以“学”为中心；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由以“学”为中心到以“做”为中心，做的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他在《劳力上劳心》一文中说：“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还说：“教学做合一只是生活法。”在《手脑相长歌》里提出每人“手脑都会用”。他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说：“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认为不对，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墨辩》提出亲知、闻知、说知。陶行知认为“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说知必须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正是在理论上的反思和实践中的探索完成了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重大变革，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一大贡献。但是，陶行知过分强调了“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系统科学的学习。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使教学过程的特殊意义变得暗淡了。

#### 四、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历史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五四”以来新教育的发展(包括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都曾经有过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评论和争议。全面的、基本的、部分的肯定或否定都有。对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论争的中心问题,是生活教育的政治方向和生活教育理论的性质问题。简而言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评论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①1951年以

前评论的基调：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sup>②</sup>从批判“武训精神”后发起的批判——主要倾向是：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方向，是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

从历史上看，1951年的批判，显然并非正常的学术批判，而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带有政治性的批判运动，要人们划清“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界限。

1957年提出应当重新评价陶行知，对1951年的批判提出了异议。不同意见的争辩，首先是政治的评析，开始时是对陶行知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献身革命斗争的崇高精神的赞扬；进而到对其教育思想发展及生活教育理论的论述和肯定。1981年10月，陶行知诞辰90周年会上，邓颖超同志致词称陶行知先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陶行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人们充分肯定并认识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历史地位，它既博大精深又具体通俗，既变化发展又自成体系，既扎根于中国又借鉴于外邦，既着眼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新教育学的雏形。<sup>①</sup>正如徐特立所言：“先生这种进步的教

<sup>①</sup> 参见张正元、魏名国：《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地位》，《行知研究》1991年第一期。

育主张,是对症下药,为治疗中国教育弊端的良方。”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①生活教育是吸取人类优秀成果而形成的先进教育。②生活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③生活教育推动了教育发展,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从晓庄师范到社会大学,先是允许共产党人在校中活动,后公开与共产党合作,成为国统区民主革命的堡垒,培养了大批革命的优秀人才,有力地支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仍有许多可借鉴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中国教育发展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对外国教育理论和方法要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借鉴,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盲目效法;对传统的教育思想要积极进行发掘整理,不能完全抛弃;正确理解和处理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21世纪所需要的真正人才,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基础上,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探索成功教育的道路。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批判传统教育、洋化教育,推动中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对破除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动手与动脑分家具有重大贡献。但作为一种新教育理论、作为教育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具体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生活即教育”淡化了教育的特殊性。他把教育寓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之中的原始状态,使广义的“社会生活教育”与狭义的“学校教育”相对立,夸

大了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其次,“社会即学校”淡化了学校的特殊性。陶行知把社会与学校合一,虽然其目的是在于改造脱离社会的旧学校教育,把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愿望是良好的,但客观上却模糊了学校教育的特殊性,淡化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再者,“教学做合一”忽视了系统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陶行知过分强调“做”的意义,片面强调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的获得,而忽视了系统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从效果来看,教学做合一更适合于职业中学教育,这也是它很难在普通中学实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生活教育理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不影响“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是教育革命的理论,也是革命教育的理论。他打倒一切陈腐的自私自利的学说,使教育无拘无束,活生生地实现于人类生活之中。把人的生活是有规律、有理性、有组织、有创造、有发展,和其他动物盲目的生活不同,明白地在教育意义上表现出来,这是他天才的发现。”<sup>①</sup> 总之,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一致的,因而,它的方向仍然是革命的,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极宝贵的借鉴意义。

---

<sup>①</sup> 吴玉章:《回忆陶行知先生》,见《纪念陶行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 第五节

### 晏阳初与乡村教育运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与土地兼并、土地集中,到了清末愈显示出其对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至民国初年,日趋严重的赋税暴敛、高利借贷、租佃苛例、豪绅欺压、军阀混乱等更使广大农村民不聊生,终于造成中国农民的破产。近代中国农民的破产,更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揭示了帝国主义为祸中华的真相。他说:“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睡下去。自外力闯入以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使整个的国家陷于不宁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sup>①</sup>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崩溃。它们倚仗武力为后盾,大肆输入毒品、倾销洋货、掠夺原料,打击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农产品的价格日趋低落,农民购买力也急剧下降,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彻底破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 页。

产。帝国主义者与封建势力的勾结,加重了社会政治的腐败,兵祸连绵,水利失修,天灾频仍。自1912年至1920年间,水涝、大旱与瘟疫不断。仅1920年,陕、豫、晋、冀、鲁五省灾民达2000万之多,死亡人数达50多万。破产的农民离乡背井,四处逃难,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乡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sup>①</sup> 建设乡村,须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着眼。而从广义角度来看,教育恰是这三方面建设的连锁工具,又是各种乡村事业的中心事业。正所谓“任何工作,莫非教育”,乡村的一切,都需要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开道。基于这样一种普遍认识,于是乡村教育一时引起人们的关注,扩展演变成为一种运动。

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其持续时间之长久,理论主张之纷繁,实验与推行规模之宏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极为醒目的一页。其中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而兴起的乡村教育这一支脉的理论与实践,极为充分地展示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更多地体现了近代中国教育家们探索教育现代化与教育本土化努力的特点。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与晏阳初。

---

<sup>①</sup> 傅葆琛:《乡村运动中之乡村教育》。



## 一、为中国教育创一新生之路

晏阳初(1890—1990),字复兴,四川巴中人。5岁入塾接受传统的儒学开蒙教育,13岁时即远离家乡进入西学堂肄习新学,并接触基督教文化。1913年入香港圣史梯芬孙学堂,继入香港大学就读,选学了当时比较冷落的政治学专业。香港的环境和个人的经历,使晏阳初深感国弱民贫的悲哀,如何育民,如何富民以为强国之本,时刻萦绕在他的脑中。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负起改造中国的责任,必须具备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但港大浓重的殖民地气氛使他不能忍受。乃于1916年夏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入耶鲁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专业。怀抱理想主义报国之志的晏阳初,在这宗教与学术共同笼罩下的长青藤贵族化学府,既体验到民主的真谛,也感受到美国国内无处不在的排华倾向。在一次年度的演说比赛时,他发表题为《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正义公理》的演讲。他说,华人在世界上任人欺侮轻蔑,连号称民主国度的美国,排华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抗议,但这只是治标。而只有自强才是谋求真正平等之道。“20世纪已是机器的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是智能的时代”,简言之,是智能专长取胜的时代,而智能专长得之于教育。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从消灭智能上不平等做起。他体认到“平民教育乃中华民族自强之本”。

晏阳初在回顾四川——香港——美国三地求学的思想经历时说:“我在川中时,只有抽象的国家民族观念。到香港后,

败国之民的羞辱,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生。我开始深切体会到国之重要,已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再进而看到美国的繁荣安定,华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国的贫愚落后。”在比较了三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之后,他表示“我不忍想象在中国土地上再出现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我立志贡献己力”。<sup>①</sup>

晏阳初留学美国期间,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英、法等协约国因战争造成人口大量外流,不得不向外招募劳工。1916年英法与中国签订招工章程,设中国侨工事务局,大量招募华工,运往欧洲战场。当时运抵法国的华工就有4万之多。这些华工,终日从事着超体力的繁重劳动:修筑公路,挖掘战壕,运送物资,掩埋尸体,苦不堪言。更由于语言不通,任凭当猪狗一般,受尽外国军官的责骂殴打。此时,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时工作会,发起募集在美中国留学生,去欧洲战场为华工服务。在“爱国之心、爱人之心、爱主之心”的驱使下,晏阳初毅然投笔从戎,于1918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即登上美国军舰,前往法国。甫抵法国北部的布朗(Bonlogue),即到5000余华工的军营中,开始了为华工的服务和福利工作,为华工翻译介绍时事动态,组织文娱体育活动,代写书信代办汇款等。由于华工不识字,致使这些服务颇为烦琐与低效。晏阳初想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教华工识字,向他们传授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页。

能组织起来，“用罢工等方法，去抵抗一切的侮辱与欺压”<sup>①</sup>。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晏阳初创办了华工营中的第一个汉文班，招收了40名学生。三个多月后，举行毕业考试，有36个学生成绩合格。从此，这一创举在英、法的华工营中推行开来，受到热烈欢迎。营门口、战壕旁，都成了华工们识字学文化的课堂，学习热情异常高涨。通过一期期的教学，华工们中能认字，会记账，能写简单家信的人越来越多。文明程度也有提高。在法华工教育的实践，使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的劳苦大众不是不可教，而是千百年来失之无教。教育可以发掘他们身上的无限潜力。在法的一年，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开端。从此，他立志从教。“1919年春季，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也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教育劳苦大众，是种创新，也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抛弃荣华富贵。”<sup>②</sup>

1920年8月，晏阳初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上海。时值“五四”运动之后，科学与民主首次提上国民的议事日程。国民教育开始引起国人注意，但其施教对象仅限儿童，属慈善性质的。以一般劳动群众为对象的平民教育也有人倡导，但实际的推动却不够有力，不够普遍。晏阳初在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氏的支持下，在青年会下创设平民教育科，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用为目标编写教材，进行教学”为方针，着手平民教育之筹划。嗣后，分别在长沙、烟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542页。

台、嘉兴、武汉等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继在华中、华北、华南各大中城市推广。

1923年,领导全国平民识字运动的总机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根本宗旨。由熊朱其慧夫人任董事长,晏阳初任总干事。这标志着中国平民教育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平教会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入农村。先设京兆、保定两实验区,实验农村的平民识字运动。1926年平教总会决定作以县为单位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总部迁至河北定县考棚,开始了大规模的针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的整体性改造农村生活的实验。定县实验历时10年,于1937年日本军队侵入华北后被迫停止。但随后晏阳初率领平教会同仁转移至长沙、重庆等地,在华中、华西继续推进乡村建设的实验。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乡村教育、农业经济、水利工程、社会行政四个专业,以培养中国乡村建设所需的实用人才。1950年,晏阳初前往美国,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继续推行国际乡村改造事业。60年代,在菲律宾成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肩负起为第三世界国家培训乡村工作骨干的任务,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誉。1985年与1987年,晏阳初二度回中国考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由此也促成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与中国的合作。1990年1月,晏阳初病逝纽约,终年100岁。

## 二、中国教育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 1. 一味模仿外国,势必导致教育破产。

晏阳初历来主张,中国教育的发展,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照搬照抄西洋的做法。

他尖锐地批评中国的学者:“很少有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与做法”。指出创办教育,习惯于东拼西凑,依样画葫芦,而不管是否合于中国国情。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旧教育,现在已经推翻,可是新教育尚未产生。现在所谓的‘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的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客观存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拿来借用。”正因为这些留学生归国后,不管国情如何,一味地照搬英、美、日的教育,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晏阳初指出,充分模仿外国,导致中国整个教育的破产。<sup>①</sup>

有鉴于此,晏阳初号召中国有出息有思想的教育家,要有创造意识创造精神,要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了解认识自己的国家问题症结所在,要针对自己的社会来创造,要把中西学术融化在一起,“具体地、科学地研究完成一套为全民而有用的新兴教育,为中国政治、教育创一条新生的路”<sup>②</sup>。

## 2. 融汇中西古今,为中国新教育创一新路。

在西方文化挟狂风劲吹中国大地的时候,晏阳初饱受西洋文明的洗礼,踌躇满志地从美国返回中国。他在法国为华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页。

<sup>②</sup>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工服务的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争雄的当前,中国国势衰微,已堕入三流国家地位。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旅欧华工的生活状况是大多数中国国民生活的缩影与代表。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是国家的根本,但他们失教,需要开发他们的智力与伟力。完成这一历史性使命,需古今中西汇通,走一条快速有效的新路。他承认自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结合的一个产儿”<sup>①</sup>,他决心“为中西新旧文化的调和,灌溉滋润,而贡献光华灿烂琳琅珍伟的花果”<sup>②</sup>。他主张中国教育界,在“20世纪这一创新的时期,应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决不要拟古也不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从中择取时代需要的部分”<sup>③</sup>。他认为创办教育,既不要仿古,也不要仿欧。既不要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也不要外国式的舶来教育。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式的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者。他说以上两种教育已导致了教育的破产。如再继续实行下去,迟早会演出促成“民族自杀”“民族速死”的悲惨结果。<sup>④</sup>他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相反他积极倡导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但提醒人们要时刻不忘自己的国情,不忘“以我为主”。他警告人们,“我们不努力,将要做外国人的附庸,不是做美国的附庸,就是做苏联的附庸,希望大家要认识这一点”<sup>⑤</sup>。他

①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9页。

②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③ 同①,第535页。

④ 同①,第297页。

⑤ 同①,第306页。

谈的是教育问题,但他由此也想到未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今天读来,智者的卓识,被其后的历史证实是极具远见的。

### 三、认识国情,对症下药

晏阳初特别强调,办教育应从国情省情县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他指出,欧美教育强调的是“求适应生活”的教育,因为他们的人民一般文化水准较高,生活程度也相当高,所以他们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们去适应生活。他们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学校里,以及为适应生活需要的部分成人上。这是他们特定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的国情与欧美不同,决定了中国教育与欧美教育应具有不同的特质。晏阳初在其已发表的论述中,对中国20世纪初至中叶教育的社会背景先后有过多次数指陈,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 1. 传统动摇,问题丛生。

自鸦片战争爆发,列强侵入中国以来,在交通日趋便利关系日趋密切的世界里,中国已不再可能维持在封闭的社会里而被迫卷入世界大格局中。因此“我中华的问题,不仅是亚洲局部的民族问题,而且是世界人类利害相关,安危与共的问题”。

经过了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所有的政治上社会上家庭里安定的生活秩序,都从根本上发生了疑问。随着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一切生活的法则起了剧变,世界范围内种种思潮的激荡,直接或间接地都会影响到中国,冲击着中国社会——从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问题丛生且关系复杂。

## 2. 愚穷弱私,民族衰老。

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他说:“现在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非瞎而何? 不受教育不知社会情形,所以有耳也等于无耳,非聋而何? 社会弄到这样,发言的是何人,大多是不做声的,非哑而何?”后来又将中国的问题归结四大病症,即愚、穷、弱、私四大病症。所谓愚,即不但缺乏知识,简直是目不识丁,中国人民中 80% 是文盲。所谓穷,即大多数中国人基本生活吃穿住得不到起码的保障,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中挣扎。所谓弱,即大多数中国人是无庸讳言的病夫。人民的生命存亡,简直听之天命,根本谈不到所谓的科学治疗与公共卫生。所谓私,中国大多数人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训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若不强,何谈邦宁,更遑论国势强大。经过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我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 20 世纪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sup>①</sup>,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民身上表现出衰老、腐朽、钝滞、麻木和种种退化现象。面对国家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国民只能是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6 页。



蚩蚩之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只能是淡漠旁观,惊骇躲避,任凭列强欺侮驱使,任凭军阀摧残压迫,任凭官僚政客弄权专制,任凭社会混乱政治黑暗腐败。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接触中,屡屡落伍,固有文化既失去统裁力,新的生活方式又建立不起来,思想上更呈现混乱分歧的状态,出现了文化失调的现象。更有些人,抑郁烦闷,暴躁妄为,形成一种恶势力,骚扰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迫、榨取,直接、间接地破坏了乡村,受害最甚的三万万以上的赤贫农民,其生活惨状,令人悲痛欲绝。晏阳初指出,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的衰老,民族的堕落,民族的涣散。”<sup>①</sup>

### 3. “误教”“无教”,对症下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华北危急,全国动摇。晏阳初提出,“中国为什么到此田地?我以为根本原因是‘误教’与‘无教’”<sup>②</sup>。

何谓“误教”与“无教”呢?他指出,中国现在受教育的人很少,而所受的教育,又多是不切实用的。分而言之,所谓“无教”即失教于民,失教于农。所办的有限的新学校,离四万万人民的需求相去甚远。所谓“误教”即当时社会所说的“教育误人”,“教育杀人”。他认为在中国办洋教育,与中国的需要背道而驰,结果是念了洋书的人,对中国的问题浑然不知。城里人读了书欣羡西洋,不关心国家盛衰。乡下人读书跑向城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465页。

里,多一个读书人就少一个务农者。他说,现在的情况“所幸误教尚小,假如误教普及了的话,那只有坐以待毙。现在还有80%的‘无教’者,正待我们去普教,故中国前途尚有可为。我们不应再拿外国教育去教他们,要创造一种中国教育,要用中国药来医治中国病,且要看清病源然后再去下药”<sup>①</sup>。

#### 4. 教育“三难”,因地制宜。

晏阳初在创办平民教育之初,就已认识到,在中国推行民众教育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国国民,十九赤贫,自晨至暮,辛苦勤劳,血汗所得,不足温饱,自无闲情逸致抛开谋生而受教育,此一难也。我国文字之难学,为世界各国文字之冠。若令穷忙平民,学尽难学之字,更属难上加难,此二难也。我国财政,已濒破产。已办教育,尚难支持,焉有余力从事民众教育,此三难也。有此三难,故造成我国今日之特殊环境,在此特殊环境之下,非有特殊方法,不足以谋适应。”<sup>②</sup>

从以上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晏阳初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有着非常清醒的估量。他看到了当时经济濒临全面破产,看到帝国主义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对中国民族造成的分崩离析,看清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政治的反动与腐败,看到在种种客观环境下中国教育事业的艰难,看到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社会问题。同时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关键“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终生事业的目标为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69页。

“除文盲作新民”。他说“四顾茫茫,终夜徘徊,觉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外,无最根本的事业,无最伟大的使命,无最有价值的生活,这是同人的自觉心、责任心、奋斗心”。<sup>①</sup>

#### 四、创建“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新教育体系

1.“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将肩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

晏阳初分两个层次论述了“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第一层,什么叫“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他说“这种教育以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新组织为目标。以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为内容。”<sup>②</sup>其教育目标,体现了“教育即生命”的原则。旨在使接受这一教育的人,要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身心,进而发扬民族的精神。其教育内容反映了“教育即生活”的原则。使接受这一教育的人,自己要决心改造他的生活,进而适应民族的生存。

第二层,怎么叫“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在晏阳初看来要切实贯彻“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两个原则,绝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297页。

不是单靠语言上书本上的教育所能为功的。教者与学者双方都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去亲自历练才成。他举例说,比如教农村青年选择良种,驱除病虫害等农业知识,不能只在教室里黑板上讲解,更重要的还是重在田地里的实地传授与实际操作。通过课堂讲解与实地传授操作,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更通过输入科学知识,造成科学头脑,启发人类可以“赞化天地”、“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这正是在改良实际生活的实验中,培养民族的新生命,振拔民族的新人格。这种在实际生活上教者与学者一同去历练的教育,就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 2. “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应是“力的教育”。

晏阳初多次提到孙中山先生关于“外国人建屋重在奠基,中国人建屋重在架梁,我们建设民主政治,请从奠基始”的观点,指出孙中山先生一生念念不忘“唤起民众”,说明他把教育看做是为国家“奠基”的伟大工程。晏阳初认为如果我们建国也是重上轻下,长此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从百多年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几十年来中国备受列强凌辱的痛苦历史中,认识到“目前的世界还是个‘唯力是视’的世界。有力者存,无力者亡;有力者主,无力者奴;有力者支配人,无力者被人支配。而今日所谓有力者往往就是那些握有雄厚资本,握有军火武器的强权者,他们正以他们的强权压迫着世界的弱小民族。”而回观中国,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着无限的伟力,但到近代,“我们的‘力’被湮没了,被压抑了,被摧毁而拒绝了。结果,使整个社会室无生机”。“中国这个弱的民族需要的是力的教育,而后才能在这唯力是视的世界里

谋生存。”<sup>①</sup>

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开发民力,就是把蕴藏在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民中伟大磅礴的力开发出来。开发民力,须从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下手;必须灌输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必须增强生产——“生产”就是力量;必须保卫健康——“健康”就是力量;必须促进组织——“组织”就是力量。晏阳初开发“四力”之说,是根据他的“四病说”逻辑推演的必然结论。他认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身上存在四种问题即“四种病症”,即愚昧、贫穷、多病、散漫自私。培养四力就是医治四病的良方。四力缺一不可,缺一就不是健全的国民,缺四就尽失其国民的意义。“以如是的国民来建设 20 世纪的共和国,无论采取任何主义,施行何种政策,若植树木于波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 社会整个生活是有机联在一起的。四种社会问题,四种病症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四力的培养,也是相互连锁的。培养四力的任务自然落在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联合进行上。

3. “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应是即知即行与建设并重的教育。

晏阳初一生孜孜不倦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其中一大特色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提倡走出象牙塔,走向平民百姓生活中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们把定县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实验室,企图通过教育全面推动乡村生活的改造与建设,坚决摒弃传统知识分子坐而论道、隔靴搔痒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1 页。

的做学问的方法。他们较科学地建立了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协同关系。他们认识到在乡村办平民教育,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之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觉悟到“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到教育的设施,在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的深刻意义。“教育者不仅是对农民为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要注意到使一般农民即知即行而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农村以教育的力量谋建设,即使教育的结果成为农村建设的力量;建设的推演,成为农村教育的环境,互为因果,以推进一切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这种方式,小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的文化方式;大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手段,建国为目的的政治方式。”<sup>①</sup>

定县实验中所创造的表证农家,最终演化为晏阳初的“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之一,即“以表证来教习,从实际来学习”。特别强调在实践中教学,把课堂搬到农村田间地头,变书本教学为实干教习。认为“举凡理想之宣示,技术之传授,试验之证实,推广之实施,都可以从表证教习来完成”,更充分地强调了“即知即行”的思想。

4. “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应贯彻基础化、简易化、经济化、普遍化原则。

近代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着一些特殊的背景:中国是饱受列强欺侮,经济破产而又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5 页。

缺页

整块时间与全部精力专门从事学习。第二要考虑到他们生活困难没有经济实力去从事正规的专门的学习,甚至连一般的课本用具也无力负担。所以千字课一般是根据科学原则,选取千余常用字,编为四册,96课。日授一课,月尽一册,每日只需一时,四个月即可毕业,既简易好学可获得基本知识,又省时省钱不影响谋生,适合平民的生活状况与财力、时间所允许之范围。惠而不费,符合经济原则。

普遍化——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应以全体平民、全体农民为对象,以整个平民生活的处所,以农民生活的乡村为教育场所;以民族再造与乡村建设为教育目标;以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为教育内容;以大队组织运用导生制办法完成综合活动,实现乡村建设为教育的方法;以家庭、学校、社会合一之综合方式为施教的方式。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大国,教育的规模之巨大,非一般可比。实现民众教育普遍化,事业宏大,非国家中央政府所能包办,更不是平教会一类学术机构或少数人所能为功,应动员当地人出当地钱,办本地事。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 五、适应现代化,培养现代人, 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晏阳初是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至深的一个学人,也是善于将理念付之于行动的实践家。他自少年时代开始从儒家文化的传统教育走出,迈入西学的门径,又经频繁往来于中国与欧美之间。他亲身领略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两相对比,使他



从两种社会生活的落差中看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最终目标是如世界大局一样要走向现代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全面现代化。作为教育家,他将“作育新民”当作未来现代化社会应尽的神圣职责。根据中国以农立国的国情,他赋予了“新民”以“现代人”的种种基本素质,他说“国家今后的大责任,将由农村青年群策群力去负担”。“我们今日只管培养他们的新生命,振拔他们的新人格,促成他们的新团结,训练他们的新生活,使他们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现代化。他们便自己能尽国家主人翁的责任,随时代的演进,解决变化无端层出不穷的种种问题。”<sup>①</sup>这段话里,他将“现代化”与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融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认为没有了科学化、合作化、纪律化等种种品质,“现代化人才”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另外,这段话也告诉我们,完备的现代化人才,必将与时俱进,有能力去面对未来世界的种种问题。这是与当时无智无识无能病弱的老愚民完全不同的一种新人,是适应现代共和国的新人。这种新人,已超越纯自然属性而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我们还注意到,晏阳初关于“现代化”人的提法首见于1934年《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是从“再造民族使命”之需要提出的。1936年,在《“误教”与“无教”》一文中再次提出,中华民族要想“在20世纪生存”,必须造就“现代人”——国家、民族、大众需要这种“现代化的仆人”。1940年,晏阳初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又多次提出该院培育人才的“六大教育目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标”，则更为完整地诠释了新时代新人才的六大必备条件。这六大条件是：“第一，劳动者的体力：①利用自然环境，爬山游水；②养成最低限度的卫生习惯；③养成健康的思想；④自力生产，以锻炼体魄。第二，专门家的知能：①有一技之长；②即学即作，即作即习；③理论与行动打成一片。第三，教育者的态度：①人人都是可造人才；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③‘作之君，作之师’。第四，科学家的头脑：①对一切求真知；②用科学的态度来解决一切问题。第五，创造者的气魄：①不苟安，求进取；②不享受，不畏难；③敢作敢为，耐劳任怨。第六，宗教家的精神：①有信仰，坚定不渝；②临大难，处之泰然；③重博爱，爱人如己；④能牺牲，舍己为人。”<sup>①</sup> 六项培养目标，从德、智、体、能诸方面全面概括了对现代化人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基本素质，反映了晏阳初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时刻拯救危亡、振兴民族的自信，以及对未来国家民族命运的理想，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新兴教育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等方面的思考。

<sup>①</sup>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5—136 页。

## 第六节

### 梁漱溟与乡村教育运动

#### 一、从农村的新生命中寻求中国的新生命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生于北京,祖先为蒙古族,与元朝皇帝同宗。

在父亲梁巨川的影响与支持下,自幼即受新知识启蒙,入中西学堂学习,并在幼小的心灵中隐然萌发了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与迈越世俗、追求上进的正大刚强之气。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从小养成了广搜博览的习惯,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在内的种种书籍报刊,并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1911年,中学毕业后,到《民国报》当记者。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有机会熟悉了许多政治人物与事件,为他认识社会提供了不少帮助。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梁漱溟内心痛苦不已,遂生遁世思想,曾两度自杀未遂。旋醉心于佛家,潜心研究佛学,写成《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各家学术,而独崇佛家,纵论出世主义哲学。该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为此,蔡元培特邀梁漱溟来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儒家哲学、孔学绎旨等课,同时开始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

儒学的开山之作。它第一次将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讨论,在充分肯定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这本书奠定了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1924年,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曹州办学,筹划创办曲阜大学。拟“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讨昭宣的功夫,使它与现代之学术思想接头,发生一些应有影响和关系”。<sup>①</sup>曹州办学未获成功,回到北京与后来成为另一儒学大师的熊十力及德国学者卫西琴共办私人讲学,共读共研。在北伐运动的感召下,梁漱溟南下上海、南京、广州考察中国的政局,并赴江苏徐公桥、南京晓庄、河北定县考察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的乡村运动事业,深感民族的唯一出路,全赖乡村的兴盛,只有替农村寻求到新的生命,才能为中国的全社会找到新的生命。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开始了促兴农业,寻求国家民族自救之路的实验。在这里梁漱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工作,通过广义的教育工程,促进了乡村的农业改良和合作事业、风俗善导、县政改革。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抗战运动、民主宪政与两党合作,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1946年3月,因不同意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张君勱所设计的以美国政体为蓝图的宪政,决计退出政治活动。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消息传来,梁漱溟十分气愤,遂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6页。

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了题为《特务不取消民盟不参加政府》的书面谈话,指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无法退出了,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民主的人都杀光?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sup>①</sup> 这表现了一个民主人士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应中共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20世纪50年代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之后,潜心从事哲学、思想、文化方面的思考与著述。80年代以来,大陆、港台乃至美欧许多国家,兴起文化与“现代新儒学”研究热潮。梁漱溟思想再度引起哲学、文化、教育界的广泛注意。

## 二、对新式教育之批评

西方以其发达昌盛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日渐丰厚的物质文化。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要求向外扩张,寻求资源与市场。于是有了称霸世界,远侵东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迎来列强的侵袭。中国人终于从迷梦中被惊醒,有了模仿泰西以求急起自救的种种举动。新式教育的兴起,就是这种种模仿中之一端。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教育试行几十年来,在艰难的摸索中前进,取得了许多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功不可没。但是,无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庸讳言,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缺憾。许多教育家为此有多指摘。梁漱溟对这些缺憾,更觉“苦闷”甚而成为一种“苦痛”。他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对新式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严厉的批评。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入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sup>①</sup>他说这些病痛非同小可,是“将以起一国之衰”,“适所以祸国而已”的重大不幸,<sup>②</sup>认为新式教育为祸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这一大乡村社会。

中国人学西方,举办新式教育,为什么不成功?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学习西方,推行新式教育,为什么就取得了成功?梁漱溟作了分析。

近代欧美教育,孕育于西方那样的社会文明,西方文明是建筑在工商业上的以都市为中心而发挥的一种文明。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中国的社会全无西方社会的种种条件,生吞活剥地搬来中国,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国情,自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强行移植,准橘为枳。

但是,日本人学西方办新式教育,情形却不一样。原因是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政治及至整个社会是从效法近代西洋的那条路(资本主义)走过来的。它效法西洋社会举办的新式教育与社会的大方向是顺符的,一致的。大方向不差,在具体推行过程中的小疵瑕就不显见,而且可以边走边修正,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6页。

<sup>②</sup> 参见《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终于成功。但中国却与此相反,中国没有能走上以工商业为基础以都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道路,教育却一味模仿资本主义的西洋教育,与社会的大方向不一致。这样新式教育推行过程中,在枝节上左修正,右修正,总归是白费,落得一个手脚纷扰而已,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那么,新教育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从总的方面,梁漱溟概括为两点。

一是不合于教育的道理。教育的任务,“原是长养人发达人的智力体力各种能力的,但照现在,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没有长养人们的体力,反倒戕害了他们的健康;不但没有长养人们的智力,反倒窒塞了他们的智慧,使聪明人变得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

二是不合于人生的道理。教育是应当趋向着理想走的。它一方面在事实上要接近符顺现实,而另一方面,则要在精神上趋离现实,领导现实。但现在的教育,恰恰相反,在事实上,它离开现实社会,不合实际且与实际乖牾;在精神上,又随波逐流,跟着社会走,全无半点理想,无法领导社会,反贻害于社会。这表现为:

教育贵族化。以学校教育为例,表现出一种非平民化的倾向。使学生养成一种贵族化的生活习惯。乡间儿童进入县城高小读书,慢慢地乡间饭不能吃了,旧时衣服不能穿了,对乡间生活产生了种种看不惯,耐不得。在洋学校里,小学生就是小贵族,大学生就成了大贵族,女学生就成了女贵族。日常起居,宿舍教室,都要佣人来伺候,自外于平民之列。

教育商业化。社会上贫富不均,致使人们的消费享受机

会也呈不平等。而这不平等莫过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给“人生的悲惨远过于其他的遭遇”;“更断了他以后增进经济地位的机会”。梁漱溟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太残酷了,“本来现社会的‘商业化的人生’就不合理,而用之于教育尤为不当”。他为那些因“生计之艰窘与求学费用之特高”而失学的“悲惨遭遇的青年”,“时时感着内心的苦痛”!

教育制裁化。梁漱溟对当时新式教育中一切都“照章办理”的“太法律制裁化”了的情形,也时时感到不安。认为国家用法律制裁人,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在利用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强调用教育的手段来弥补法律之不足。如果办教育不讲教育而过于讲法律,那尽可不办教育。

缺乏教育精神。梁漱溟对现行学校制度中缺乏教育精神这种弊病多次予以指摘。1924年,因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他辞去北大教席,去山东拟在曹州中学高中部基础上筹办曲阜大学。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竭力倡导“着眼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的教育精神。20年之后的1944年,梁漱溟不忘宿愿,又来到广西桂林,拟创办私立勉仁中学,以继续对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研究与弘扬。他再次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内中列数实行新教育制度以来中学教育的种种弊端:

第一,教职人员缺乏教育精神。教育工作者,因谋生无术,而以教育为安生之计,所以从教无坚定恒久之志。

第二,学生整个生命心身两面被忽视,所受教育零碎偏枯,浅薄无力。

第三,训育方法与教学方法两皆失宜。



第四,学校教育 with 家庭情谊缺乏沟通联属之道。

这些指摘,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切中要害的中肯意见。梁漱溟虽然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清末以来新教育学校制度中的种种失宜与弊病,并过激地指责其“祸国”之罪,但从他言论的精神实质来看,他还是充分肯定了新教育在冲击礼教束缚青年,冲击以空疏无用误导青年的传统教育方面的历史功绩的。

### 三、东西教育之比较

1921年末,梁漱溟应邀分别前往山西与山东演讲。在山西的讲题是《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在山东的讲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两度讲演中,梁漱溟从东西方教育的不同,论及东西方文化之异趣,由此,判定中国教育在面对西方化对东方的“节节斩伐”下如何保持“自我”应持的基本态度。

西洋人的教育偏重在知识一边,如各种自然科学之教;中国人的教育偏重在情意的一边,如孝悌之教。东西方的教育,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其实,合理的教育,对于知识与情意都是必要的不可偏废的。

先说知识教育。知识是生活的工具,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的传衍。西洋人的人生路向导致了他们的科学发达,他们视知识为生活的指导,认为自然界的问题需自然科学指导,社会人事问题需社会科学指导,知识传授就成为西洋教育中最重要事情。从苏格拉底到杜威都强调教育要授人以知识。中国人则不然,讲究率性与直觉,不相信科学。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几千年来鲜有知识方面的成就。生活方面,也不

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习惯于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应付。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可以说,知识的授给与智慧的启迪,是西洋教育之得,而恰为中国教育之失。

再论情意教育。情意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但并非说,情意不需要教育。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识只是生活的工具。“求之在人,得之在人,运用之在人”,“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而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则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二者相比,情意教育应居首位,知识教育则居其次。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中国的孔子,一生的职志在借礼乐去调理人们的情意,导人以一种合理的生活。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正如孔子所示,重视孝悌忠信,看重道德的教化,而从旁调理情志顺导本能,培养人的身心条理,引致生命活泼。就注重人的生命本身的情意教育来看,正是中国教育之得;而忽视人的人生本身,疏于教化,也恰为西洋教育之失。

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其原因是由于两方文化路径的根本异趣。梁漱溟于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担任教席时,即将研究的兴趣投入“东西文化之比较”方面。历时四年,正式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第一次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系统加以讨论。即西方、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人类三种生活样式的历史渊源,各自的哲学根据以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出全面考察与比较分析。这一比较模式的提出,为人类文化

史的研究展现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刻,梁漱溟及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影响所及,至今未泯。

梁漱溟认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体系,在根本哲学、生活态度、思想特质上都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向前要求,就是奋斗的态度,这是生活的本来路向,其生活是直觉运用于理智的,表现为改造自然,追求幸福的生活态度。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对生活持随遇而安的态度,其生活是理智运用于直觉的。生活上安分知足,物质生活简单朴素不作奢望,不积极从事发明创造。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对生活是转身向后去要求,以根本取消当前的问题或要求为解决之策,其生活是理智运用于现量。

三类文化系统中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一特点恰恰成为东方和西方学术的一个分水岭。西洋学术的产生,就是由于智慧向外用,分析观察一切,这就是科学。而东方——中国和印度,则正好掉转头来,将智慧运用于自身,以求完善自身。具体表现在学术上,西方的特点是:①心思偏于理智。②满眼所见皆物,不免以对物者对人。③科学大为发达。④科学研究与农工商各种事业相通相结合。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农

工商业又引发了学术研究,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一致向自然进攻,征服自然。东方的特点是:①心思偏于理性。②忽于物而着重人。③科学不得成就。④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总之,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学术“是两条不同的路: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的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sup>①</sup> 梁漱溟将东西方学术文化作一比较之后,为西方文化总结出三大“特异色彩”,即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之异彩,学术思想方面科学方法之异彩,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之异彩。并明确表示,这些都是中国学术文化所缺或所应向西方学习的。<sup>②</sup> 但是,梁漱溟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意思。他指出,中国文化虽然物质生活方面不进步,有关的一切文物制度因此也不得开发,但中国人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避免了西洋人风驰电掣追求物质享受而带来的精神沦丧与苦闷。中国文化虽然在社会生活方面,因古代相传的礼法与教条使自由不能实现,个性得不到伸展,社会性不得发达。但中国人在“家庭里,社会上,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不能不算一种优长与胜利”<sup>③</sup>。中国文化,虽然在精神生活方面,没有西洋宗教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没有西洋文学那种伟大的气概深厚的思想和真情,但孔子那种似

①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 页。

② 同①,第 127 页。

③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9 页。

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的精神都是恰到好处的。

梁漱溟依他的“文化三路向说”，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指出中国人面对未来应有的抉择：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sup>①</sup>

据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梁漱溟是力图以客观的态度审视东西文化的内涵、特色、实质，以及其形成发展的机制。他肯定了两方文化中认为应该肯定的主流，同时也指出了各自存在之缺失，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积极健康向上进步的东西，根本改过其“以物对人”的态度。在承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后相形见绌”的现实前提下，要自振自作，充满自信地复兴中国文化中最根本最积极的因素，为世界的未来作出新贡献。

在诠释了梁漱溟东西教育之不同，“盖由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使然的之后，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以不同历史文化为背景的东西方教育之相异与得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我们就知道，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中，该如何保持自我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避人之短，扬己之长。在发扬中华传统，走世界共同趋向之现代化过程中，使我们的教育更减少盲目性，更增强自信心。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8 页。

#### 四、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自道同开始的近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国际与国内的两重压迫,天灾与人祸的两种摧毁,使得乡村命运,日益沉沦而走向死亡。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无疑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解体,但这是一个外部条件,中国的诸如水旱灾害、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社会问题是造成农村破产的内部原因。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帝国主义与军阀”或“贫愚弱私”,在于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这里他所说的“社会组织构造”,指的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因此,重建一个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组织构造,完成正常形态的社会文明,就是中国人所面临的任務。

梁漱溟根据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性质的认识,以及他对未来人类正常形态社会文明的判断,对近代以来的种种社会改革运动作了分析。他认为种种的“维新革命先进后进是自己搞乱自己否认的一部滑稽史”,都是“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实则为一向的大错误”<sup>①</sup>。一切“震撼于外力,诱慕于外物”的西化运动,都失去了自觉与自主。他断言,中国不能也不宜像日本一样,模仿西洋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病态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歧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 页。

途。它以个人为本位,提倡自由竞争,以此促成工商业偏畸发达,内而形成阶级斗争社会惨剧,外而酿成国际大战世界祸灾。中国原本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上来求中国的新生命,中国不能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使都市畸形发达而破坏乡村之后尘。中国要走谋乡村发达,完成“乡村文明”,进而以促兴农业而引发工业的路,梁漱溟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问题”<sup>①</sup>。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迭为推引,逐渐以合作之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这样,社会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文化重心都在乡村。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仍可以在都市。在他看来,中国的工业化在此,新社会文明的创成在此,中国之得救在此。所以他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担当着民族自救的乡村建设运动,离不开教育,或者说,运动的本身就是一项教育工程。中国固有的文化,千余年来盘旋不进。而西洋自近代开始则快步如飞,完成了工业化,步入了现代文明。中国受此威胁,于是不得不试图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改造。中国的社会改造实质就是“如何企及现代文明之问题”,<sup>②</sup> 就是“融取现代文明以求自身文化之长进”的工夫。而“此融取而长进的工夫固明明为一巨大之教育工程,则

①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7页。

② 同①,第400—401页。

势必特有其教育设施而后可”<sup>①</sup>。我们应当注意到,梁漱溟在60多年前,就明确地一语道破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的问题,认识到“完成社会改造的工程即教育”。这一观点反映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反映了他们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估量。他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充分调动了教育的力量,以推动社会的礼俗改革、生产改进、县政改革。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混乱,阶级压迫深重,国家主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格局下,企图以教育的力量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问题,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构想。梁漱溟没有超越这一认识的局限。

## 五、社会本位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思想之提出

1933年2月,国民政府邀集各地民众教育专家讨论“推行民众教育方案”,问题涉及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的地位,一时难以定论。于是会议推定梁漱溟与钮惕生、高践四、陈礼江、孟宪承五人会后起草一方案。梁漱溟执笔完成了《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这份草案,既未将社会教育加入现行学制系统,也不是于学校系统外另立一平行之社会教育系统,而是以社会教育为本位树立一新的系统,将现行学校教育纳入这一系统之中。其根据有三点:

<sup>①</sup>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1.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分。

梁漱溟不同意将现行学制系统作为中心设施或正统,而将社会教育作为补充设施或非正规教育的做法。认为这种分判无学理真据,形式上有时也难于区别。正确的做法是应将两种教育融和归一,组成一完整合理的教育系统。

2. 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的东西不断地成倍增长,不可能在学校教育中学尽。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知识也会老化而不适用。所以教育势必将延及至成年乃至终身。人们只有时时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3. 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

教育的社会功能,表现在:在平时要能为社会延续文化而求其进步,即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在改造时期,如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时,先靠教育培植革命力量,后赖教育作理性的善后,如改造文化,创造文化。

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中国已“破坏得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一点一滴的教育。”<sup>①</sup>

《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教育设施包涵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教育、各项人才的培养训练、学术问题的研究实验

<sup>①</sup> 《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8 页。

等,以社区统属教育对象,设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镇)学五级。乡(镇)学以基本教育为主,程度为最低级教育,编制上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区学以基本教育之高级及技术训练之预备段为主,程度为乡学高一级教育。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包括现制中之高小、高级民校、职业补校。县(市)学以训练技术人才教育为主,程度高于区学,设升学预备部、职业训练部、自由研究部、乡村师范部。省学以专门技术教育及实际问题研究为主,程度相当于高等教育,可视情况分科。国学以学术研究为主,程度为最高级教育,可视学术门类分科。在教学方式上,各级教育视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学校式教育或社会式教育。

该草案,体现了“以学校为地方社会中心,以教员为社会指导”的思想。企图校正现行学校教育离开社会、偏于知识技能、不顾地方情形强求一致等弊病。以图“以教育促社会于生产,以社会促教育于生产”,最终改造社会。这一认识远比当时一般的“生产教育论”为全面,充分发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

该草案,明确地提出“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的连续性终身教育的思想,要求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阻隔,使人的一生成为受教育的一生,使整个社会成为学习的社会,是一种开放式教育的建构,反映了作者的超前认识。作者征引了桑代克关于“成人与学习”的研究,认为“年龄实在对于学习之成败是一个小的因素,能力兴趣、精力和时间乃是重要原因”的理论。他预测今后人类社会,教育的时间将会放散而且延长。我们注意到这一“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是在其社会本位教育、成人教育的框架中的自然延伸,是针对所谓的“正规教育”

的学制系统而建议将学校制度纳入社会本位教育系统之中,强调了教育的民主性,机会均等,要求教育贯穿人的终生;强调了教育的整体性,要求突破学校制度中僵硬与机械的弊病。以社会本位的组织,统盘筹划整个的社会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以及未成年人的学校教育。

在世界教育史上,1916年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间建立“平衡与协调关系”的主张。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建议确立以成人教育为“国家永恒的需要”,成为“普遍的”“终身的”教育文件,都是世界终身教育的先声之议。梁漱溟在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工农业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认识到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必要性,而加以倡导,确实反映了他的思想的超前性。

“社会本位教育系统”在结构形式上脱胎于中国古代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是一种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将办学的自主权放在地方,削弱官办教育,强调社会自办教育,加强了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教育与地方政治经济建设的结合。而教育的重点着重在基本教育——包括民众教育与小学教育,也明确了上下级学府的侧重点。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的实验中,也设置了村学乡学,村学乡学不单纯是教育组织,而且取代了区乡镇公所等行政组织,成为乡村团体。寓政府于学府,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纳入教育体系里,强调了社会改革期与平时不同,应将重点放在社会教育。此一时期教育的任务不在绵续文化而在除旧布新,试图以教育的立场,养成乡间新的教化、礼俗、自力。《草案》从形式到内容都仿照宋代《吕氏乡约》,制订《学众须知》、《学长须知》等,以规范乡民与

社会各阶层。社会本位教育系统以及邹平的乡村教育实验,保留了古代教育的许多痕迹,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组织结构与现代教育发展的需求,也不符合现代化教育发展的规律,所以最终没有被当时社会接受。但内中许多设想反映了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对改造中国社会的见解以及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本土化相结合的思路,其中的一些精神,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也具有借鉴的价值。应当说,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也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及研究。

## 第七节

### 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早期探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最先觉悟的革命的分子,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教育问题。试图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也须如政治一样,应当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人从革命者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姿态,对形形色色的封建复古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猛烈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吹起了战斗的号角。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相继涌现,思想理论

界经过几次影响很大的论争之后,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杨贤江、钱亦石等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及现代科学知识,系统地总结了人类历史上有关教育的现象,阐述了教育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从思想的传播,进入了一个试图结合国情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阶段。

### 一、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sup>①</sup>、“五四”运动的总司令。<sup>②</sup> 陈独秀早年多次留学日本,深受法国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社会达尔文思想影响。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他以《新青年》为阵地,介绍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猛烈抨击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认为要根治“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其办法只有科学。他呼吁“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③</sup>,提出了“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

① 毛泽东:《陈独秀被捕及营救》,《湘汉评论》创刊号。

② 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③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陈独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有过重大的贡献。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了一些教育上的重大问题,令当时的知识界耳目一新。

### 1. 关于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这是思想界十分关注而又是常常混乱的一个问题。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原是唯心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玄学派和所谓的“科学派”之间的一次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不失时机地对这次论战的性质,作出了深刻的评论,并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

陈独秀针对胡适之的《科学与人生观》书中的观点指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它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sup>①</sup> 他批评多元论者,将经济与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并列的观点,表明唯物史观主张的是“物质一元论”。说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都只是经济的儿子,而不是它的弟兄。他以教育为例,说明只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才可能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他认为,教育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也还会受制于政治,指出“必政治进行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认为中国“倘不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sup>②</sup>。

<sup>①</sup> 《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sup>②</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5页。

尽管,教育受制于经济和政治,但教育并非只能是消极的适应,而仍然不失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指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sup>①</sup>。我们理解,这里他既强调了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促进作用,同时强调了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与革命热情进而达到革命之最终目标,与其“物质一元论”并无矛盾。

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既然如上,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教育的作用呢?陈独秀认为,教育只有与社会打成一片,在适应社会经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宏博效力”。指出“社会与教育分离,其弊之最大者莫如减少教育的效力”,这包括训练的效力,学术适用的效力与文化普及的效力。

具体到当时中国的教育应怎样发展,陈独秀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在致罗素的信中指出,中国人都感觉到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那么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我个人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及日本的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及刻薄没有良心了。……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及工业在资本主义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sup>②</sup>。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52 页。

② 同①,第 52 页。

## 2. 关于中西新旧教育比较。

陈独秀将文化教育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一种历史现象来观察,认为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展演进,指出,东西文化在性质与内容上有着许多根本性的不同。

1917年,陈独秀曾就中西教育的不同进行过比较,指出西方教育是自动的,启发的;中国的教育却是被动的,灌输的。西方教育是世俗的,直观的,具有科学的实证精神,并注重职业教育,所教功课是日常的生活和技能;而中国教育只注重神圣的经典和幻想。西洋教育是“全身的”即注重包括智力的发展,思想的陶冶,体格的锻炼;中国教育则较多注重大脑的记忆。他认为“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才能使中国文化赶上西洋的近代文明。

如果说,上述中西教育之比较,更多地表露了陈独秀思想发展历程上进化论的痕迹,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思想家企图摆脱中国民族贫困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那么在三年之后,当他就中国的新旧教育进行比较时,已有认识上质的飞跃,他已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新旧教育的区别在于“采取的主义和方法的不同,并不只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不同”<sup>①</sup>,科学地指明了二者在本质上的区别。这些不同表现在:

从教育的精神上来看,新教育是趋重社会的,旧教育则是趋重个人的。新教育注重社会的改良,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

<sup>①</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2页。



片,一切发育都建立在社会的必需上面。而旧教育则把社会与教育分开,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校成了社会中的特殊事业,学生成了社会上的特殊阶级,教育的目的重在造就“个人的伟大”。

从教育的方法上来看,新教育注重启发的教育,旧教育注重教训。新教育是要寻找机会,用种种方法训练儿童的身心器官自由生长,发育他们的观察力、想像力、道德、情感等能力品质,而旧教育则限制受教育者的知识自由活动,造成机械盲从的习惯,戕贼人类可贵的创造天才。

陈独秀关于中西教育的观点影响了同时代许多人,纠正了人们用简单的、绝对的观点与方法评判中西古今教育优劣的做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教育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此时,陈独秀已认识到摆脱穷困落后的地位,中国唯有革命,才能成功。

## 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猛烈地批判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逐步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积极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1920年在北

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研究会,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积极研究与探索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精辟见解的论文,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1. 揭示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社会功能。

他认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它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sup>①</sup>这段文字中,首先提出了“表面构造”与“经济构造”,即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应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确认了经济是“唯一的物质条件”的基本观点。他曾排列了“表面构造”与“经济构造”的关系表,其所列的表面构造中虽然没有提到教育,但是在另一篇文章中,却明确地提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sup>②</sup>。

其中“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无疑包含教育在内了。因此,教育属于上层建筑,是以经济基础为生存依据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在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中首先确立。

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政治的好坏决定着教育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139页。

的成败。他说：“前几年，人家以为教育与政治是两件事，不用妥协。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sup>①</sup>。因为，人类社会自从分化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对垒之后，社会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不但掠夺劳动者的物质成果，同时还剥夺劳动者们受教育的权利。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剥削，他指出：“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物质的结果，是资本家莫大的暴虐，莫大的罪恶，那(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可怕，更是可恶！”<sup>②</sup> 人们的教育权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以谈教育，办教育，“决不能把政治离开不顾”。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问题，“非打破这个阶级不可”。他举出俄国革命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社会问题”<sup>③</sup>。

## 2. 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教育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袁世凯复辟登基后，将孔子之道立为“国教”，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写进“天坛宪法草案”。企图以尊孔读经复古等全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成果，开历史倒车。李大钊坚决地予以批判反击。

首先，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表层构造与基础构造，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原理说明：“凡是精神上的构造，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5 页。

② 同①，第 633 页。

③ 同①，第 587 页。

都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的……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sup>①</sup>；指出我们视孔子虽“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但孔子学说已与时代不相符，“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sup>②</sup>，怎么可以拿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残骸枯骨”来规范约束 20 世纪的共和国国民呢？现代国家的宪法本应是现代国民血气精神之结晶，而袁世凯的宪法却是“陈腐死人之宪法”，是“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是与自由精神相违背的。正是鉴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时代思想不符合时代精神，不符合宪法宏旨，不符合自由原则，所以李大钊坚定地举起了反对封建偶像权威的旗帜。

李大钊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的勇士。他参与了 1922 年教育界“非宗教大同盟”的发起组织，揭露了宗教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种种罪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1925 年全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学校的“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 3. 论证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性。

李大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给终把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与指导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重视，认为“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变革的先锋”。他教育青年，为肩负起改造社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 页。

<sup>②</sup> 同<sup>①</sup>，第 264 页。

会的历史重担,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并将其主持的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一个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sup>①</sup>李大钊教导青年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号召青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sup>②</sup>

李大钊特别明确地指出青年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sup>③</sup>他号召中国青年要向俄罗斯青年那样,到农村里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业;到劳工中去,为劳工们争教育权,提倡设立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将工读打成一片,将耕读打成一片,向劳工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宣传革命理论。

李大钊在 20 世纪的前两个十年间,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分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以及教育问题,在知识分子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也为当时及以后进步力量推翻旧制度创建新制度的事业中提供了全新的观念与进步的思想武器。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2 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05 页。

③ 同①,第 648 页。